

目 录

肖家大地主罪恶纪实·····	1
“彭善人”的剥削史·····	11
血泊中起家的胡凤璋·····	21
“吸血鬼”楊掌高·····	31
宁德县的“海霸天”·····	44
三大領主的罪恶·····	54
穷人头上的四把刀·····	66
血泪話祠堂·····	73
罪恶的地主庄园·····	82
夏收时节的一场斗争·····	100
警惕地主争夺青年的阴谋活动·····	106

肖家大地主罪恶纪实

冀 岱 黄桂秋 米仁孟

湖南省西部辰溪县龙头庵的肖隆汉、肖隆湘两兄弟，是集官、匪于一体的大地主。肖隆汉罪恶深重，当地群众骂他是“肖閻王”。肖家的发家史，是地主阶级罪恶的例证，也是湘西人民在地主、官僚、土匪压榨下受苦受难的例证。

通官匪踞地称王 欺百姓霸田夺地

“恶霸肖隆汉，收租万万担”。肖家兄弟凭着反动势力，掠夺霸占，剝削榨取，到解放前夕，已在辰溪、溆浦、怀化、黔阳等县占有土地六万余石（合一万二千多亩），建立庄场二十四处，共有佃户两千多家。从溆浦大江口至黔阳安江镇，一百八十里长的沿河两岸的土地，都是肖家的。

肖家大地主这些土地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翻开他的家谱看看：

肖隆汉的祖父肖光英是当地七团半的团总，独霸一方，素有“土皇帝”之称，连清朝的县官、举人之流，到龙头庵一带来，也得首先去肖家拜望拜望。他除了收租放高利贷以外，还包征田赋，种植大烟。清朝某年，肖光英包征龙头庵一带田赋，将搜刮来的农民血汗，美其名曰“国税”，声言要运往县城交归国库，暗地里却勾结土匪，拦路搶劫了这些粮食和金银。清朝县府心中有数，丝毫不加追究，又叫他向农民重

征。这一年，成千上万的农户为了重交田赋，被逼得倾家荡产，而肖家的田地却突然增加到四千余石。到了肖隆汉、肖隆湘这辈（肖隆汉父亲肖桂林，三十来岁就死了），更是穷凶极恶。他们有政权：在省里，肖隆湘是省参议员；在县里，肖家舅子顾明岩是县长；在地方，区公所就设在他家里，侄子肖洪暄（特务）是区长，堂弟肖隆凤是乡长；至于保长甲长，不过都是肖家长期豢养的看门狗罢了。在军界，肖隆汉当过团长，又是当地联乡大队的大队长；肖隆湘儿子的岳父米贤松，号称过“司令官”；两个女儿的公公都是营长。在江湖上，肖家是匪首李癞子、熊舛哇、石玉湘、米金龙的后台老板，长期有一个土匪副官唐偉人住在他家，保持联系。肖隆汉自己还任过陈永蒙匪部的副司令。肖家兄弟实际上掌握着龙头庵、黄溪口、仙人湾一带百姓的生死大权。他们依仗这些反动势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压榨盘剥，无所不为，不过一二十年光景，肖家土地就猛增到六万多石了。

地主家收租万担 佃户们家破人亡

在肖家的残酷剥削下，多少贫苦农民倾家荡产！多少无辜百姓在肖家的屠刀下人头落地！多少穷人的儿女在肖家受尽了折磨！

肖家自己养着枪兵，经常有二三十人，最多达两百多人。因为肖隆汉是联乡大队的大队长，也掌握着所有的地方武装。这支武装，名义上是保护百姓，防御匪患，实际上是强盗土匪。白天他们催捐逼税，敲榨勒索；晚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

每年秋天，肖家像撒鱼网似的把狗腿子、枪兵和豢养的

保甲长，放到各地去催租逼债。哪家佃户只要吐出一个“不”字，就有倾家荡产、挨打坐牢的危险。有一年天旱歉收，仙人湾佃户肖瞿哇要求减租，伪乡长米贤典亲自带领枪兵，以“抗租”的罪名把他捆去，吊打得死去活来，还把他家的猪、牛、衣物、口粮等全部家财抄去。一九三八年，黄溪口一带遭大旱，岩湾村的佃户们欠租交不起，要求减免。于是肖家勾通匪首熊舛哇，土匪出人，地主出枪，扑向岩湾村，纵火烧毁房屋两栋，杀死农民两人，抢去耕牛八头、银洋一千二百多元，衣物被褥不计其数。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劳动人民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只能含冤饮恨，在心里记下这笔血债。

每年秋收时节，肖家村前的岩板大路上走着被迫送租的人群；肖家村后的河边，排着送租的船舶。农民打下的粮食，成担成担、成船成船地流向肖家的仓库。仅田租一项，每年肖家就要吞进粮食二百多万斤，而终年劳累的农民，却“镰刀上壁，就没饭吃”。

贫农肖老大，虽然知道他父亲曾被肖家逼租逼债，卖掉了年仅十岁的同胞姐姐，但是自己还是逃不出肖家的魔掌，为了活命，一九二七年又向肖家佃进了二十二石田。

佃种的第四个年头，绰号“巴颈鬼”的狗腿子肖善祥向肖老大传话说：“老爷要把你佃的田当掉，当价是一石田两担谷，你要就承受，不要就当给别人去了。”老大怕提佃，只好承受了。他将自己仅有的一块茶山、两匹穿衣布和几担吃饭谷全部作抵，还不够，又东拉西借，好不容易才凑足这笔钱，把田当好。从当田那天起，肖老大全家就挖葛根，吃野菜，一直吃到第二年新粮食下来。

当田第三年，狗腿子就来贖当了：“老大，你还种这田嗎？种，就要出佃租錢，一石田三担谷，合計六十六担谷，除去贖当谷四十四担，你还要找出二十二担谷。”种田人，田是命根，老大只好答应再給他二十二担谷。晚上，老大翻来复去，睡不着觉，他一笔一笔地默算：这二十二石田，开始花二十二担谷佃租錢，种了四年，交租谷三十五担二斗，承当三年，花去当价谷四十四担，贖当倒找二十二担，在七年中，一共送給地主一百二十三担二斗谷，平均每石田一年得交八斗干谷，請地主、狗腿子吃飯喝酒和送礼的費用还在外。想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唉！佃戶哪能不穷啊！”

即使这样，几年以后，二十二石田还是被地主夺佃了。肖老大走投无路，只好到洪江一带划牌糊口，家室留在当地討米度日。

被肖家地主剝削得傾家蕩产的佃戶，又何止肖老大一戶？有的比肖老大的遭遇更悲更慘！

农民米永龙租了肖隆汉十八石谷田。一九二一年，辰溪大旱，永龙一家老老小小，全部出动，挑的挑、提的提，与天爭粮，好不容易才收得稻谷三担五斗。不料肖家地主拿着算盘一敲，竟要永龙交租谷七担二斗。狗腿子和枪兵一天一催，最后坐催逼交，口口声声威胁說：“不交就把你关起。”种田人不种田又干什么呢？永龙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只得把房屋和农具全部卖掉交租。肖隆汉还嫌他交迟了，硬把租給他的十八石谷田夺了。永龙沒有办法，只好留母亲在家，自己带着一儿一女去討米为生。不几天，大儿子活活餓死在一个岩洞里，女儿也餓得不像人样。为了死里逃生，永龙就把心爱的女儿卖給洪江的一戶人家，自己到牌上去拉絳。过了一些

日子，永龙回家探望，母亲已活活饿死在龙头庵的一个过路亭上。一家五口，在肖家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下，仅仅一年就家破人亡了。

吃人不吐骨头的肖家地主，还经常用高利贷盘剥佃户，每年仅息谷收入就有十来万斤。遇到灾荒年月，更是肖家放眼发财的好机会。一九二一年，这里遭受大旱，农民吃糠吃菜，卖儿卖女，成千上万的人离乡背井，四处逃荒，沿路死尸横躺，四野哭声震天。而肖家地主却乘机大发横财，借一担还两担，有田作抵，无田屋作押。这一年，佃户舒昌景借了两担谷，利加利，利滚利，四年之后还了十八担；农民米厚光借谷六担，到期还不起，被夺去二十二石好田；农民米如来借钱八十串，当年利息三担谷，第二年连本带利七担谷，第三年就是十四担谷，八年光景，一栋价值五百担谷的房子就变成了肖家的产业。没有田地房屋的，就莫想借到粒米分文。雇农米寿喜，无田无屋，到肖家去借谷，肖隆汉兄弟不但不借，还怕他挑起“打富济贫”的乱子，竟以“想偷肖家谷”为罪名，派家丁黑夜把他暗杀了。贫农米恩老的弟弟不甘心饿着等死，准备邀人去肖家打仓出谷。肖家地主闻讯后，立即买通驻地宪兵围住米家，米恩老的弟弟被当场打死，米恩老也被子弹打伤。

当牛马长工惨死 施诡计地主狠心

肖家除了有两千多家佃户外，平常雇有长工六、七个，到了秋天，还雇零工、月工三十人以上。他对雇工的剥削同样残酷毒辣。

肖老黑是一九三九年进肖家做长工的，每天总是鸡叫出

工，天黑归家，送肥挑谷，經常是两担两担的落起挑。由于劳累过度，不久就患了内伤病，飯量一天一天的减少，人一天一天的消瘦。肖家地主不但不給他医治，还是照样要他天天出工。有次老黑三天沒沾水米，要求地主让他休息一天，哪知吃人不吐骨头的肖隆汉竟高声大罵道：“吃了我的飯，拿了我的錢，不管你病不病，反正得出工，出不得工就滾出去！”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老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带病出工。这样病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并且大口大口吐血，肖隆汉怕老黑死在他家，便叫狗腿子把老黑赶了出去。老黑剛出大門就跌倒死去了。狼心狗肺的肖家地主叫狗腿子把尸首送到老黑家里，沒有給分文安葬費用。老黑死后，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了。就在这年，老黑的母亲活活被餓死，妻子只好带着两个小孩出外討米，流落他乡。

长工肖洪寿的遭遇也同样悲惨。肖洪寿在一九四六年开始帮肖家做工，当面讲好十二担谷一年，簽訂字約时，地主耍了个詭計，說：“洪寿，字約上写錢，一担谷五千块，全年工价十二担谷，合六万块，到时候，要錢拿錢，要谷出谷。”忠厚老实的肖洪寿，当时沒有看穿地主的詭計，便順口答应了。

地无一寸，田无一角的肖洪寿，全靠做工养活一家五口。上工时，領了一担上工谷，往后几次去支領，都被地主借故推脫了，肖洪寿全家只得吃糠嚙菜。

洪寿自从上工以后，每日鸡叫起床，点灯收工，整天忙个不停。好容易熬过半年，虽然无米下鍋，吃糠吃菜，但他还是寬慰自己，心想：工价谷迟早总不会少給吧。到了六月夏荒，洪寿满怀希望地去領工价谷，不想地主婆却回答說：

“洪寿，你的工价是六万块钱一年，正月间你担了我一担上工谷，现在你还我一担谷，我把全年工价六万块都预支给你。”在旧社会，物价一日三涨，正月间一担谷五千元，到六月已暴涨到二十万元一担了。这个晴天霹靂，震得洪寿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一阵他对地主婆说道：“太太，我的工价是十二担谷一年，当时老爷说了，要钱拿钱，要谷出谷，照你刚才说的，我还要倒找出来，那我全家就会饿死！”地主婆拿出字约大吼起来：“混账！千里江山凭点墨，纸上明明写的是钱，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家饿死不饿死，与我不相关。”忠厚的洪寿这时才知道自己上了当，可是刀把子在别人手里，有什么办法呢？眼泪只有往肚里流。

肖家屋人間地獄 穷人女惨遭折磨

灭绝人性的肖家地主，不仅在政治上迫害农民，在经济上剥削农民，而且经常以残酷的手段残害穷人的子女。

一九二一年，辰溪久旱不雨，穷人走投无路，卖儿鬻女。七岁的云娥就在这年卖给肖家当丫环，陷进了人间地狱。她除了给地主婆送茶送水，倒痰倒尿，捶腿捶背外，还要打扫庭院。每天见亮起床，一直要到半夜伺候地主和地主婆们抽完大烟、吃了夜宵饭以后才能睡觉。年幼的云娥，不仅担负着这样繁重的劳动，还经常遭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

在云娥被卖进肖家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肖隆湘两口子躺在床上抽大烟，云娥送茶慢了一步，地主婆照着她的脑袋一连就是几烟袋锅，打得云娥眼前一黑，就昏倒了。等她苏醒过来，地主婆又拿起捅烟管的铁钎，掰开云娥的小嘴，残忍地捅进她的咽喉，铁钎不停地捅，嘴里鲜血不断地流，凄

厉的惨叫声由大变小，由小变无，云娥又昏死过去……

云娥被折磨得病倒了，狼心狗肺的地主，不但不给医治，还怕她死在肖家要出埋葬钱，就用竹竿把她赶了出去。奄奄一息的云娥，刚爬出肖家大门就昏倒了！当她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座古庙的神桌上，一位慈祥的老妈妈给她端来了一碗姜汤，一碗稀粥。在这位老妈妈的细心照料下，经过半个来月的时间，她的病才渐渐好起来。

肖家地主听说云娥病已养好，可以做事了，又逼她回到肖家去。在这人间地狱里，云娥度日如度年，好容易熬过十二年，这时地主见她长得端正标致，便起了歹心，企图奸污后逼她做小。云娥知道后便躲进后院的夹墙内，想伺机外逃。地主以为她已逃跑，立刻派枪兵四处拦路设卡，挨户搜查，并扬言：“人在谁家找到，谁家的瓦要一片片飞，人要一个个变成肉泥。”到了第三天，云娥饿得支持不住了，悄悄地从夹墙内出来，刚刚逃出大门就被那些“守门狗”抓住，像对待死犯一样，五花大绑。紧接着，地主的皮鞭、棍棒像雨点似地落在云娥身上，棍棒打断了，云娥昏倒了。最后，将她转卖给别人。

在肖家，像云娥这样受苦受难的丫环又何止一个啊！地主家根本不把丫环当人看，经常拿丫环开心取乐。少爷小姐们把丫环梅香装进麻袋，用两根粗绳子捆着麻袋口，吊在屋梁上，作“燕子扑水”的“游戏”。少爷们拉起绳子一上一落，麻袋里发出一声声惨叫，屋檐下发出一阵阵狂笑。灭绝人性的地主婆站在旁边拍手称快：“玩得好，玩得有味，再来几下。”无数次的吊上跌下，一直到梅香不能动弹，麻袋里没有声音了，他们才离去。

压榨尽民脂民膏 乱挥霍荒淫无度

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終年劳动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而飽食終日的地主們，却把搜刮来的农民血汗任意揮霍，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肖家住的是高楼大厦：一个十五口之家，住的房屋却有五十六栋，大小二百七十九間，有堂楼、客厅、接待室、书房、臥房、綉楼、綉房、佛堂，另外还有专供少爷小姐們玩乐的魚池和花园。肖家大院的每一块磚，每一片瓦，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一丈多高的青石墙，全是农民从三十多里远的高山峻岭地区，一块一块抬来的。

肖家穿的是綾罗綢緞：家里常年雇着六个裁縫，遇到紅白喜事还要另外加人。仅肖隆汉一个人的杭紡衬衫就有三十多件。肖隆汉的祖母米氏婆死后，随尸体埋进棺材的嶄新綢緞衣褲就有八十多套。

肖家吃的是山珍海味：每餐四碗五碟，早晨是人参、蓮子、白糖蛋，夜宵是大烟加“桂花飯”。据当地群众估計，肖家的生活費用，每人每日在十担谷以上。仅鴉片一項，除在当地收买外，每年还要从安江一带购进四五百斤。

肖家出門是騎馬坐轎，飽食終日靠寄生过活的地主們，个个喂得比猪还懶。由肖家大院到龙头庵集鎮，不过半里路，来回也要坐轎。甚至連看戏都要人抬着看。

肖家的紅白喜事，更是揮霍无度。有一年，为他祖母过生日，曾演唱大戏两个多月，杀猪二十头，宰牛十五头，大办筵席，共花谷五千多担。肖隆湘的大女出嫁前，十多个裁縫整整縫了一年的衣服，陪嫁的衣物有五十多箱，錦綉緞

被八十余床，金銀首飾不計其數。肖隆漢的嫂嫂三十來歲死了，入殮時，頭帶寶珠，腳墊元寶，嘴含玉石，背貼金片，一手一只金鐲，一指一個金戒，同死人一起埋葬的金器總共有一斤多重。

一九四九年，隨着全國的解放，龍頭庵人民終於盼到了太陽。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很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減租反霸運動，把這惡貫滿盈的肖隆漢、肖隆湘兩兄弟鎮壓了。從此，這一帶的人民才翻身見了天日。

“彭善人”的剝削史

中共南召县委办公室

河南南召县皇路店核桃园彭家，是清朝以来方圆几百里闻名的“地主世家”，这家地主曾經挂过“千頃牌”。彭家的土地、庄园，横跨方城、南召、南阳三县，占有百多个村庄。夏、秋两季所收租谷，每年都在四万石以上。他家楼房瓦舍千余間，“家郎”、“院公”二百多名。京、府、两鎮（北京、南阳府、石桥和皇路店鎮），都設有彭家开的当鋪、作坊、粮行和錢庄……。当时彭家恬不知耻地說：“走京串府不住別人店，卖粮不用挑子担，元宝關河用不尽，百里走不出彭家田。”

这家大地主有这样一個发财致富的傳家宝：“兴家立业要心狠，对人处世装慈善。”因此，他在对农民进行殘酷压榨的同时，还对农民施行一些小恩小惠，一遇灾荒年月，把一些霉米、烂衣、坏药、剩飯舍給灾民，借机大肆宣揚他是“彭善人”。

“彭善人”恶而不善

每年的正月初二，彭家总要大摆筵席，把佃戶請到他家吃喝一頓。这頓酒席并不是好吃的。彭家为了使佃戶种好地，多交租子，多为他家支差服杂役，把酒席分为三等，上等席是两葷两素的四个盘菜，四个碗菜，外加一壶酒；中等

席是四个菜，一壶酒；下等席是两个菜，一壶白水。佃戶們坐席，是由彭家根据对他家“貢獻”的大小予以安排。佃戶赵全有，家里人口多，劳力少，地未种好，彭家就在下等席的桌位上，写上赵全有的名字。入席后，彭家的人在筵席上大声喊叫：“赵全有喝水，赵全有喝水……”大肆进行諷刺与奚落，旁边的狗腿子們，則癡笑不已。接着，彭家当众宣布，赵全有种地不下勁，掐了地，限期迁走。赵全有央人托友，最后送上四只大肥鴨作为礼物，彭家才收回“成命”。像这样“杀一儆百”的筵席，佃戶們无不提心吊胆！

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災，彭家拿出高粱面和花生秕子炒面九百多斤施舍。面带饥色、瘦骨嶙嶙的难民，每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湯匙，饥民們还是照旧冻死餓死。就在这哀鴻遍野，餓殍載道的时候，彭家数以万石的粮食，在市場上高价出售，乘劳动人民之危，大量置买田地。不仅如此，还借着荒年饥岁，向佃戶催地租，討“頂手”（即押金），逼要高利貸，有不少人为此傾家蕩产，亡命他乡。如佃戶刘长聚，以积累多年的錢財，租种彭家十来亩地，这年有点收成，彭家逼刘长聚多交租谷，长聚只好卖了一头耕牛抵上。彭家并不因此滿足，又依仗伪民团团长的权势，抓长聚家的壮丁，长聚央亲托友，把另一头牛卖了一百二十元全部送上。誰防这个狼心狗肺的彭家，夜里又派人把长聚弟兄俩抓走，押入獄內四年，結果长聚被折磨致死，其弟出獄后不久也死了。人被陷害，长聚家被封門閉戶，財產被彭家沒收，长聚的女人气得死去活来，領着几岁的孩子到方城县逃命去了。又如，佃戶郭光太因为災荒，借彭家一千元高利貸，半年未过，彭家逼着还債，头一天郭光太卖掉一头耕牛还債，第二天彭家

就把地掐了，全家七口人，只有扶老携幼，出外乞討度日。类似事件，不胜枚举。据粗略統計，至少有二百多家佃戶受过彭家的害，其中有三十多戶弄得傾家蕩产，妻离子散。

因此，农民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彭善人”的真实面目：
“彭家面善口甜，做事心如刀劍，
压迫剝削穷人，抓兵迫害掐田。”

血海尸山上的“千頃牌”

彭家为了掩飾其剝削发家的真相，編造与散布出許許多多騙人的鬼話。說什么“彭家占着活龙活凤的好坟地，風水好”啦，說什么“彭家有一根神扁担，两头有两个蝴蝶，越挑越輕”啦，又說什么“彭家从山西迁到石桥，夜里神仙托梦，扒出活銀子窖”啦，等等。現在，讓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来看看彭家到底是怎么发家的？

清朝乾隆年間，彭家的老祖輩彭太，从山西曲沃县經商而来，寄居在石桥的一家招商店里。彭太当时看到这一帶农民衣食无着，就在人們的生活上打主意，做起了白布买卖。由于彭太善于投机倒把，招搖撞騙，卖白布的小生意日益兴隆，由肩挑、車推，一直发展到大車拉。彭太通过卖白布剝削起家，有了雄厚的資本以后，又想了很多发财之道。他到处開設当鋪、粮行、作坊与錢庄等等，不仅在石桥变成了个“彭半街”的大东家，而且在北京、开封、成都、南阳等地，也設有彭家的店鋪和錢庄。据傳說，当时彭家的店鋪、錢庄有几百处，每年的商业剝削約有几十万两銀子的收入。

在彭家拥有大量的金銀財宝后，就开始兼并土地。第一次买南阳枣庄二十四頃地；第二次买尹店李家十六頃地。在

田地发展到五十多頃时，貪得无厌的彭太，为了“振家声”，大置庄园，不惜花費数十車元宝，給自己的孙子彭令捐了一个四川省的道台官銜，这个官管轄三州、二十五个县。“朝里有人掌了权，置田买地不費难”。彭令上任以后，依仗职权，貪赃枉法，到处索賄賂、刮地皮。据当地群众說，仅一次即从四川拉回来金銀財宝数十車，再次大量买地。在彭令当道台后短短几年時間内，彭家的土地由五十多頃，猛增到六百多頃，在清朝末年挂上了“千頃牌”。

国民党当权以来，彭家搖身一变，成了反动政客。彭家长門七代孙彭东川，先后当过国民党軍团长、团总和伪乡长；二門的彭五卿、彭和卿二兄弟，通过金銀、美女等“升官之道”，爬上国民党师部軍法处长、南阳县司法科长、中学校长和区长、乡长、保长等职位。彭家这些孝子賢孙，在爬上政治舞台后，不仅依仗权势保护他們祖先剝削来的家业，而且还繼續穷凶极恶地兼并与霸占土地。彭家的土地面积空前地发展到八百六十頃。至此，彭家的土地西至花子岭，东至方城境，南至蒲山店，北至鴨河口，方圓三百多里，成了“彭家天下”。

八百六十頃，就是八万六千亩土地。这个数目，占山多地少的南召县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以上！

八百六十頃，是彭家从一家一戶，一村一庄剝夺来的。

八百六十頃土地中，不知飽含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泪、尸骨和财产。有人說：“彭善人”家的“千頃牌”，挂在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海尸山之上。看来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彭家除了通过商业剝削、捐官刮地皮之外，还通过极其殘酷的封建土地剝削，慘絕人寰的灭門霸产等駭人听聞的手

段，吞并土地。請看核桃园附近农民的血泪控訴：

农民租种彭家的土地，首先得交出数量巨大的“頂手”。佃戶馮金志，为給彭家交“頂手”，卖掉耕牛，卖掉仅有的財產，結果三冬沒穿棉衣，五夏光着脊背。佃戶刘志寬，因交不上彭家的“頂手”，逼得一家人逃荒在外，至今杳无音信。

彭家对佃戶的封建土地剝削，比一般地主更要殘酷。佃种彭家的土地，有所謂內批与外批。所謂內批，使用彭家的耕畜农具，收获后倒一（佃）九（彭）分粮；所謂外批，佃戶使用自己的耕畜农具，收获后倒二（佃）八（彭）分粮。彭家通过殘酷的土地剝削，每年都要收入粮食四万多石，折二千多万斤，每人每年若按吃粮四百斤計，可供五万多人吃一年。遇有荒春饥岁，彭家即运粮上市，高价出售，乘人之危，每年春荒，彭家就要卖粮万石左右，大搞粮食投机。而广大佃戶，辛勤一年，所得无几，甚至只落下“一把谷糠两行眼泪”！佃戶李云德給彭家种了一百亩地，平均每年收入粮食二万余斤，按外批“倒二八分粮”后：彭家得一万六千多斤，他只落三四千斤，不够全家食用，若遇荒年，就只得逃荒要飯！

即使如此，“閻王爷还不嫌鬼瘦”。彭家在收地租、放高利貸的时候，还大斗进，小斗出，出九进十一。每年只此一項，就可剝削二三十石粮食。佃戶楊来方，在一个春荒年借彭家五斗粮食糊口，拿回家用斗一量，只有四斗五升，到归还的时候，彭家改用大斗量，說的还五斗，实际还了五斗七升。

彭家还有一个置田买地的“門路”，就是依仗权势，通过抓兵派款，大飽私囊。楼上村乔老七有个儿子，彭五卿借着

抓他家壮丁的名义，数次敲詐勒索銀錢，得了錢还不罢休，又将人抓走。为此，乔老七活活被气死，他的老伴哭瞎了双眼。仅据李村、尹店、楼上等村的統計，伪保长彭五卿每年拉壮丁收入現洋一千二百元，折合小麦六十多石；每年派枪六十支，計四千八百元，折合小麦二百四十石。这些銀元，絕大部分被彭家霸为己有。

彭家置买田地，实际是不顾农民死活，强取豪夺，甚至灭門霸产。为了霸占姚砦姚家五十亩好地，彭家兴詞架訟，打起官司，用金銀买通官府，終于霸占了姚家的土地。为了买李家的几亩地，彭家口出大言，要用五十两重的銀錠摆于地面，摆多大地方，买多少土地。李家执意不卖。为此，彭家恼羞成怒，抓李家壮丁，派枪款，多方迫害。彭家在兼并土地中，連貧穷农民的小片土地，也不輕易放过。农民严二娃，只有祖輩遺下的四亩土地，彭东川强硬要买，严二娃貴賤不卖。为此，彭东川給严二娃戴上“通匪窩匪”的帽子，将严二娃打得皮开肉烂，最后，只得把土地无偿地送給彭家。

看，彭家的“千頃牌”就是这样挂起来的啊！

血肉筑成的“天井院”

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坐享清福，彭家在赤地千里、哀鴻遍野的清朝嘉庆年間，大兴土木，兴建宮殿式的“天井院”。

这座天井院，从破土动工到落成，前后历时四十年。动工时，彭家請来的技工，还是个年青小伙子，及至房子落成，这个技工已經成了年逾花甲的憔悴老人了！

四十年間，彭家动用千多名佃戶，不分昼夜地从事笨重

的劳动，而不給分文报酬。四十年間，因劳累致死的木工、土工、技工、小工……数以千百計。在我們近几年的水利建設中，从李村西坡挖出許多劳动人民的尸骨，就是当时彭家建“天井院”的铁的罪证。

彭家对“天井院”的要求极为严格，既要华丽壮观，又要經久耐用。为修筑大門外的牌楼，不仅提出了质量要求，还必须要在百日內完成，錯前錯后都不行。头一次以七十天時間建成了，彭家吹毛求疵，迫令毀掉重新建筑。就这样，連續返工三次。天井院的房子建成后，彭家逐座驗收，方法是用石礮从房頂滾下，如若瓦烂了，必須重新修补。

“天井院”用劳动人民的血肉建成了。整个“天井院”共有房二百多間，里边分客厅、堂厅、接官厅、戏厅、书房、綉房、臥房、倉庫、花园等。这些厅房无不是五脊六兽，龙舞凤翔，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儼然像一座朝廷的宮殿。在后花园里，有从各地移植来的奇花異草；用万斤玉石雕刻的魚池。当彭家花天酒地在庆幸“天井院”落成的时候，劳动人民在啜泣控訴道：

“提起天井院，令人痛断腸；
尸骨作根基，血肉砌成牆。”

臭不可聞的寄生生活

解放前，核桃園方圓几百里的劳动人民，經年累月掙扎在饥饿綫上，而大地主彭家，却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寄生虫生活。

彭家的吃喝，不說逢年过节，平常日子，也总是山珍海味，頓飯成席。比如吃饅，用鸡蛋黃炸饅絲，美其名曰“金

包銀”；用蛋白炸饅絲，又叫什么“銀包金”；喝湯，要喝什么“鯉魚鑽金豆”（糯米湯丟山藥）、“元寶湯”（糯米湯丟紅棗）等等。就此猶嫌不足，還經常喝冰糖燉白木耳湯、燉金柴湯，來滋補胖得發昏的身體。一九四二年大旱災，勞動人民連樹皮草根都吃不上，而彭家把几缸變蛋用來喂豬！這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彭家的穿戴，不論大人小孩，每人都有二三十套用綾羅綢緞制成的衣服。彭和卿春秋四季的衣服竟達三四百套。彭家的人們，不穿洗漿過的衣服，就連嬰兒使用的尿布，用香皂洗用几次後，就拋棄了！

彭家共有三十多口人，而丫環、僕人和看家的打手，就有二三百人。姑娘有丫環，少奶奶有僕女，少爺跟有保鏢。一個少奶奶使用有專職洗衣服的、做雜活的、喂養公子小姐的嫗姆等六七人，掃地、倒尿、送茶、端飯等一切勞動，都由僕人去干，丫環僕女甚至還得冬暖床、夏打扇。彭家十五輛轎車，五十匹騾馬，終日忙個不停。彭家豢養的打手們，也跟着車馬忙得團團轉。偽軍團長彭東川外出，總是前簇後擁地跟隨二十多個打手。

婚喪嫁娶，更是揮金如土，大顯排場。彭海生的母親死時，彭家行禮點主，宴客五百多桌，送殯的絡繹不絕，收到殯禮五萬餘元。盛殮的棺材，是紅心柏木，黃香焊，緞子糊，并用銅錢粘一層，油漆得黑明照影；死者頭枕金磚，腳登元寶，手拿銀元，口含寶珠，頭戴鳳冠霞帔，身穿綢緞；棺材之重，二三十人抬不動，大車拉不動。同時，彭家還請來几十个紙工，用五色紙做了一個多月，做出成堆的亭台樓閣，騾馬車轎，童男童女等等。埋葬那天，送殯的人馬長達二十

余里。据当地群众估计，仅埋葬这个地主婆，彭家起码得花费四十多万斤粮食，够一千多个农民吃一年！

在“天井院”里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公子小姐们，过着骇人听闻的荒淫无耻生活。

吸食鸦片，这是彭家的“传家经”。老的吸，少的吸，男的吸，女的也吸。“天井院”大约拥有十多杆烟枪，从早到晚有人在吸食鸦片。彭家年年用肥沃的土地种鸦片，多者二百余亩，最少不下三五十亩。被彭家奸污的妇女，就不知道有多少了。人称野兽的彭五卿，竟奸污妇女五十多人。

在“天井院”内，彭家家族内部的丑事百出，臭不可闻，这里就不加以叙述了。

请看，“彭善人”家究竟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善人”啊！

“彭善人”的阴魂未散

一九四七年南召解放后，彭家这座封建堡垒被劳动人民摧毁了。但是，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贫农孙长法，原是彭家佃户，翻身后当上农会的干部，在土改中，他带领群众没收分配了彭家的财产，彭彦氏怀恨在心，雇了三个歹徒，企图暗杀孙长法，幸由贫农彭善林透信躲避，才未遭杀害。彭东川在南召解放后，跟随伪二八团来南召扫荡，吓唬农民说：“谁敢分我家的土地和家业，我回来算账时别说我心狠。”彭家还雇人暗杀民兵队长贾文庆，连杀三次未遂，并将农会组长冯金志的妻子抓到南阳，非法刑讯，打得死去活来，南阳解放后，她才逃出魔窟。受苦受难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剿匪反霸，先后将彭五卿、彭先舟、彭东川等吃人的野兽，捉拿归案，并在万人大会上处

决了。广大农民无不拍手称快。

接着，通过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彭家霸占农民的土地、粮食和各种家具什物，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农民分得土地房屋后，无不心花怒放，笑逐颜开。经过农业合作化，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这里的穷困面貌改变了，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现在的核桃园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过去阴森森像是阎王殿的“天井院”，现在变成了欢乐的幼儿园。

要记住：劳动人民翻了身，地主阶级是永远不会甘心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反革命复辟。彭璧如为了想实现自己在背后掌权的阴谋诡计，就曾经施用美人计腐蚀与拉拢地方干部。彭少白的女人彭彦氏，在土改后领着儿子看地边，指地块，背地写了变天账。这一切事实表明，彭家的“阴魂”未散，随时随地都在幻想死灰复燃，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因而对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们要永远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

血泊中起家的胡凤璋

湖南省階級教育展覽會供稿

从湖南汝城县向城西北走十五里，就是馬桥公社的石泉村。这里山环水抱，聚居着三百四十多户人家。白天，歌声响遍田野；夜晚，明亮的电灯照耀着欢乐的人家，一片兴旺的气象。可是，解放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情景：田間、路旁是面呈菜色、鶉衣百結的农民們做着笨重的劳动，而山上是累累的荒冢，村子里听不到一声欢笑，四周一片死气沉沉，活象一座人間地獄。这座人間地獄里的“活閻王”，就是汝城县大官僚地主胡凤璋。

胡凤璋是湘南汝城县石泉村人，他既是官僚軍閥，又是地主豪紳、土匪恶霸。上与伪省主席薛岳、国民党省党部書記长張炳等大官僚党棍紧紧勾結，下有一批狐群狗党八面助威。他还拥有一支龐大的反动武装，盘踞在湘南、粵北、贛西一带，橫征暴斂，燒杀搶劫，达三十多年之久，霸占的田土近万石，杀害的人民数以千計。他自称为无敌的“湘南王”，群众却罵他是“活閻王”。

“残忍成性赛豺狼，称霸称王据一方；
宁見阴間閻罗主，莫碰世上胡凤璋。”

这就是过去湘南人民对他的詛咒，也是对他罪恶統治的控訴。

血手起家

“活閻王”胡凤璋，是从屠杀农民、镇压革命的血泊中起家的。他用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血和泪写出了他的罪恶累累的家谱。

胡凤璋从小就是个流氓，凭借他的一身武艺，称霸乡里，欺压群众。一八九六年，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在前清两广总督部队二棚当什长（相当于班长），驻扎在由汝城县通往广东仁化县的必经要道——高排，专门对一些小商小贩拦路“收税”。那时有一个姓田的小商贩下广东卖米，为了想躲避税卡，抄着小路行走，被胡凤璋发觉了，一枪把他打死。不久，田家联名告状，胡匪畏罪潜逃，随即投奔广东，在韶关镇守使朱福全（汝城人）部下当一名教练员。由于他忠于封建王朝，获得了主子的信任，先后担任过“千总”、“哨官”（相当于连长）等职。

胡匪爬上反动军官的阶梯以后，更加露出他的凶残本性来。一九一五年初，广东乐昌八排山一带的瑶族兄弟，因不堪忍受残酷的反动统治与民族压迫，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当地反动统治者无法对付，胡匪便自告奋勇，带兵前去镇压。由于瑶族人民防备森严，一直无法攻破。胡匪便采用毒计，派手下一个特务带领几个人伪装商人，挑了几担烟酒到瑶山内部侦察，后被瑶族首领发觉，打锣集合，包围了他们，要把他们杀掉。特务见机而作，因为他会说一口瑶语，诡称自己是瑶族人，与瑶族首领认“同年”，并办了一桌酒席宴请瑶族首领，特务带头饮酒，给瑶族首领饮的是麻药酒，结果被麻醉。特务马上派人回去通风报信，胡凤璋立即赶来，血

洗了八排山，山上尸橫遍地，血流成河。

胡匪的血腥罪行，得到了反动統治者的加封贊賞。然而，好景不常，沒有多久，他的主子朱福全被另一个軍閥打垮，他也跟着丢了飯碗。但他丢职回家后，很快就同湘、粵、贛边界的土匪取得联系，还同九峰山上的一个土匪头子結拜兄弟，到处招兵买馬，打家劫舍，正式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

血 洗 农 会

一九二七年以后，由于“秋收起义”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湘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燃起了燎原的革命烽火。当时汝城县城成立了工人糾察队，农村也紛紛成立了农会和农民自卫軍，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紳給予了狠狠地打击。这时候，胡凤璋的匪軍被国民党收編起来，蔣介石还封他为“中将游击司令官”。因此，他的反革命气焰更为囂張，对人民革命运动更加仇視。正当广大人民将革命紅旗高高举起的时候，一个血洗农会的惨案就在石泉村发生了。

那是一九二八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駐扎在广东坪石的胡匪“司令部”門外，来了一个陌生人，自称是“司令官”的同乡，一定要会“司令官”，胡匪接待了他。这人是石泉村逃跑出来的恶霸地主胡竟明，在胡匪面前，他哭丧着臉說：“如今乡里搞得糟透了，那些穷鬼公开造起反来，成立了什么农会、糾察队，今天打土豪，明天分田地，……司令官的太太和公子只怕都危險啦！”胡匪一听，跳起脚吼道：“你回去吧，我自自办法！”

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石泉村的人們都已熟睡了，村子里忽然傳來汪汪的狗叫声，被惊醒的人們輕輕推开窗子一

看，只見一團團黑影在四周亂轉，一些農會幹部想走出去看看，剛一開門，幾支槍口就對准了他們的胸膛，胡悠厚、胡樹才等一批農會幹部被匪兵綁走了。

第二天一清早，農民們從胡鳳璋的房子邊經過，看到門口有人站崗，屋裡發出棍棒打人的響聲，受刑人的慘叫聲和胡鳳璋的狂吼聲，大家才知道是胡匪回來了。

胡悠厚被抓走後，他的母親和妻子哭得死去活來，迫不得已，只得到胡鳳璋家裡去求情。這時，穿着一身黃呢軍裝、滿臉殺氣騰騰的胡鳳璋出來了，他冷笑道：“早知道有我司令官就好，現在來得太遲了。”最後才允許她們與自己的親人見一面。悠厚支撐着被打得遍體青腫的身體，對母親和妻子憤憤地說：“快不要要求他了，老虎不會有人心的。怕死就不革命，革命就不怕死。你們要好好撫育我的兒子，叫他為我報仇！”

兩天以後，村北傳來了槍聲，在鐵山坳這塊荒坪上躺着革命烈士胡悠厚、胡樹才的屍體，鮮血染紅了這塊土地。村里許多人聞聲趕來了，看到兩位革命同志躺在血泊中，個個義憤填膺，內心裡充滿着對革命烈士的哀悼，和對胡匪的無比痛恨。

村里人都知道，胡匪嗜殺成性，他是不会輕易放過其他幾個被抓的革命幹部的。果然不出所料，沒過幾天，他又把胡美章、胡斐章、胡春錦、胡壽古等人殺害了。這次滅絕人性的屠殺，把十二個被捕的同志打死了七個，其他五個同志也被打得半死不活。

血洗農會後，胡匪更加受到反革命頭子蔣介石的贊賞，更是趾高氣揚，張牙舞爪，成為反共的急先鋒。一九二八年

初，一部分南昌起义的革命战士，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經广东乐昌到湘南宜章，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当紅軍部队路过乐昌时，正同胡凤璋匪軍相遇，胡匪妄想消灭这支革命部队，向他的主子邀功請賞，便亲自帶領他全部匪兵攻打，当即被我英勇的紅軍战士包围在坪石达十余天。这时胡匪的第三个儿子胡南德从青洞带兵赶来，企图为他父亲解圍，刚一赶到，就被我軍打死，胡匪最后狼狽地逃到汝城边界，才保存了他一条狗命。

殘 害 人 民

胡凤璋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是說不完的。据現在石泉村一些老人回忆和揭露，胡凤璋是一个豺狼成性、杀人不眨眼的血腥劊子手。他同历代暴君一样，可以随便捉人杀人，任意施以各种毒刑，根本不把受害者当人看待。他殘害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各种毒刑，不下一百种，最常見的是脚镣、手铐、坐黑牢、水牢、木棍铁条拷打、雷公尖等等，最惨无人道的是割鼻、割耳、挖心、挖眼睛、穿乳房、竹弓分肢、活埋，等等，他还恶毒地用鉛絲穿鼻、穿耳。成百成千的劳动人民，受了这些酷刑拷打以后，有的成了殘廢，有的在声声惨叫中死去。农民胡狗奴就是被劊子手胡凤璋挖心而死的。

胡狗奴是石泉村一个年方十八岁的青年农民，富于正义感。当他看到胡匪在乡下杀人如麻的罪行时，气愤极了，便說道：“胡凤璋这样乱杀人，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把他的心挖出来，看是不是黑的。”不料这几句話被胡匪的爪牙胡竟明偷听到了，告訴了胡匪。当天晚上，胡狗奴就被抓走

了。

“狗奴，听说你要挖出我的心看看，是不是？”胡凤璋坐在太师椅上，怒视着被五花大绑着的胡狗奴，劈面就问，并发出一阵狞笑。嗜杀成性的胡凤璋一露出这阴险的狞笑，就表示又要杀人了。

“现在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怎样的。”不等狗奴回答，胡匪狂吠起来。

第二天，在石泉村北铁山坳这块白骨成堆的杀人场上，竖起了三个木桩。中午，匪兵把被打得浑身鲜血淋漓的胡狗奴拖来，还把周围的群众赶到杀人场。胡凤璋手拿“文明棍”，大摇大摆地走来“监斩”。四面站着武装的匪兵。被带到刑场的狗奴，眼里射出仇恨的目光，直逼胡凤璋。刽子手把狗奴的两手钉在木桩上。一刀从胸部戳进去，把狗奴的心挖了出来。被赶来的乡亲们见此惨状个个流泪，把头摆过一边。胡匪似乎还不解恨，对着狗奴的尸体踢了一脚，然后骂道：“你们都给我滚开！”乡亲们愤怒不已，个个紧握拳头，把怒火深深地压在心里，等待报仇的一天。

在胡匪的血腥迫害下，光石泉村一个地方，被他杀绝的就有十多户，更多的人则被逼得远走他乡，妻离子散。

掠 夺 田 地

胡凤璋在残酷地屠杀人民的同时，对农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千方百计地霸占农民的土地。

胡照兴是胡凤璋的近邻。他祖父遗留下来六亩多好田，水旱无忧，早就被胡凤璋看中了，便起了掠夺之心。他指使伪保长去抓胡照兴壮丁。胡照兴有两兄弟，按照国民党抽丁

办法：三丁抽一，二丁緩役。胡照兴完全有理由緩役，但是胡凤璋不管这些，令伪保长到照兴家里抓人。照兴全家七口人，只有一个劳动力，抽走后生活怎么办？逼得沒有办法，便向胡凤璋借了五十块光洋，請了一个人頂替。誰知把人送去后，伪保长却說不是本人不能消差。这可急死人了，只得向伪保长說好話，請他到胡凤璋面前讲讲情，他开始摇头不答应，只好再向胡凤璋借了二十块光洋送給伪保长，才勉强答应去試試看。

这一关暂时过去了，可是借了这笔“閻王債”怎么办呢？每年要交利谷九石，开始一年恰逢大旱，次年照兴又死了祖母，真是禍上加禍。胡匪看到胡照兴无力还賬，正是逼債夺田的好时机。就在快过年的前几天，胡匪派出几个狗腿子逼債，每人每天要一斗米的催差費；还不起，第二天逼債的增加三人，每人每日的催差費由一斗米增加到三斗米；第三天，胡匪又派出四人逼債，每人每日四斗米，旧賬还不起，三天內，又欠下催差費二石四斗米。胡照兴沒法，决定忍痛卖出点祖业。本村地主胡品珍开头願意用三十二石谷买下門口几分秧田，这正好还清这笔“閻王債”。胡凤璋聞訊，立即把胡品珍喊来，威胁他：“紅契在我手里，如果你胆大就买。”胡品珍一見风头不对，忙說：“岂敢！岂敢！”夹着尾巴退了出来。

別人不敢买，照兴只得去求胡匪，挨了一頓毒打之后，胡匪还跳起脚罵他：“沒人买就来找我了，你給我滾！”接着又威胁他：“你欠我的賬，如果三天不交清，六亩田全部归我。”照兴沒有办法，只好答应把六亩多田全部卖給他，接着說道：“請你算一下，看还要找我多少谷？”胡匪一听，板起面孔

答道：“哼！要算賬，那你就准备点谷来找我；如果你不提算賬，就看在同村人的份上，两不相干算了。”

胡照兴一家几代遗留下来的土地，就是这样被胡匪的血嘴吞噬了。

这只不过是胡匪霸占成百成千亩土地的一个小小的事例，而霸占田地也不过是胡匪经济掠夺的一种手段而已。据了解，胡匪的掠夺手段多达二、三十种。比如打抢行劫、栽罪罚款、包赌抽头、设卡征税、贩卖鸦片、武装走私、霸山开矿、贩卖奴婢、借神敛钱、杀人夺产……多得不可胜数。而每一种掠夺手段，都包含着劳动人民备受剥削和迫害的许多辛酸故事。

胡凤璋这样巧取强夺所得来的财产，是无法数计的。有人粗略地作了一个统计，他掠夺的田土有九千多石，汝城县二千多亩，湘南、粤北、赣西几县十八个庄，每年收租谷不下四千石，山林不下千余块，大的一处方圆几十里。房屋总共有二十九栋六百八十多间，分布在汝城、宜章、桂东和广东、江西等地。至于他的金银财宝，更是无法计算。在他的老巢“上古寨”里，筑有一个“藏金洞”，金洞修成后，为了灭口保密，他惨无人道地把所有的石匠都杀死了。

穷奢极欲

旧社会是劳动人民的“地狱”，是剥削阶级的“天堂”。胡凤璋在这个“天堂”里，把从劳动人民身上吸吮下来的大量血汗，任意挥霍，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

他住的是高楼大厦。一九二九年，胡匪强迫汝城十八万人民，每人出光洋一块，重修他的老巢“上古寨”，以一年时

間修成，有房屋百多間，最高有五层，室內地面全是罗汉磚鋪成的。胡匪一家就住在这座富丽豪华的“宮殿”里，周圍炮樓林立，有几营匪兵專門保卫他的“安全”。

穿的是呢毛綢緞。胡匪有六个老婆，每个老婆都有几十口皮箱。大老婆有一、二十件皮衣，冬天床上墊的是火毯，虎皮毯，被盖全是鴨絨湖絲，連睡覺都要穿湖絲背心。

吃的是山珍海味。胡匪每天六頓八餐，餐餐四碟五碗。早晨起床就要吃一碗“燕窩湯”。連喂猪也要放猪肉花生油。

胡匪家里經常雇有十多个长工，养有十六个丫环，專門服侍他們。长工喂猪、喂馬、养狗、煮飯和干各种杂活；丫环送茶送飯，抹桌扫地，洗衣叠被，以及为那些“太太”、“少爷”洗澡梳头发。胡匪荒淫之至，所有丫环都被他奸污过，要是稍有反抗，即遭毒打，有的还被折磨而死。

胡匪揮金如土，一九四六年三月，胡匪七十岁生日，大开筵席。事前，他派出爪牙四出赶猪牵羊，到广东买海味，在湘潭买美酒，去广西取山珍名产。在石泉村搭了两个大戏台，喊了两个戏班子唱戏。生日那天，方圆千里的官匪豪紳都来“拜寿”，連伪湖南省主席薛岳也为他送礼，祝寿的对联堆滿一樓。这样一直鬧騰了半个来月，每天二百多桌。吃不完的寿面寿桃，連同殘羹剩飯一齐倒在門前池塘里，三个月后还发出熏人的臭味。这一場寿，花掉光洋一万多元，值稻谷三千多担，够全村人整整吃上一年。

血 價 血 还

一切反动統治階級都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胡凤璋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造了“天堂”，并且进一步加紧了

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迫害。他一面四处派出爪牙，严密监视群众，一面收买县里的所谓“文人学士”撰修县志，故意颠倒黑白，把他那血腥罪恶说成是“无量功德”，把他豢养的那班土匪武装说成是百战百胜的“健儿”。此外，他还自设兵工厂，制造大批武器，不断扩大反动武装，以便巩固他的反动统治，幻想长期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但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越残酷，就越能激起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湘南人民对胡凤璋的罪恶统治，进行过许许多多的斗争，他们日日夜夜盼望共产党来摧毁胡凤璋这座罪恶的堡垒。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九四九年，解放大军南下，国民党匪军纷纷逃窜，胡匪在蒋介石的密令指使下，企图负隅顽抗。我湘南游击队在广大群众积极支援下，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下午，一举攻克了匪巢“上古寨”，活捉了盘踞湘南三十多年的劊子手胡凤璋，并立即处决。血债血还，人心大快。从此，石泉村人民和湘南人民一起，重见天日，开始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吸血鬼”楊掌高

群 文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笕桥人民公社水墩大队，虽然位于“天堂”之内，但在解放以前，这“天堂”乐园，却是属于“吸血鬼”楊掌高等地主恶霸的；对于劳动人民来说，那就是一座活地狱！现在，虽然解放已经十多年了，但是，水墩人民提起楊掌高，仍象“冬天喝冷水，点点在心头”。这个阶级仇，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地主楊掌高，是水墩村一带远近闻名的“吸血鬼”。这个“吸血鬼”特别阴险、刁猾，他诡计多端，心黑手毒，吸血无厌。

楊掌高的父亲屈賢卿，是弄口街上的一个大恶棍，他明面上是摆咸鱼摊，暗地里是什么坏事都做。楊掌高（他从娘姓）从小跟他父亲做坏事，学得了一套欺压农民，霸人财产，吸人血汗的本领。

七、八十年前，水墩村还是一片四面环水、荒无人烟的土墩。后来，温州、萧山、绍兴等地连年闹灾荒，每年都有一批批的农民，拖儿带女逃荒到这里来，为了活命，他们风里来，雨里去，饿着肚子烧茅草，割刺蓬，搬石头，掏树根，辛勤地开垦着一块块的荒土。

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十多年时间过去了。水墩的荒地成片成片开出来了，正当人们指望着能从这块浸透自己血汗

的土地上，得到一年比一年好的收成的时候，賊眼狼心的楊掌高，就眼紅得流口水了。他昧着良心，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勾通官府，以祖業為名，每亩花了二百四十個銅錢的錢糧稅，領得了坍塌頭等地方的一大片土地“圈照”，霸占了農民黃春發、楊連卿、楊生佩等用血汗開出來的大片土地。當時，水墩村的農民氣極了，要到衙門告他一狀。但回頭又想，“錢能通神”，楊掌高有官府撐腰，窮人上衙門告狀，還不是金鑾殿上告王子——自討苦吃！人們只好把滿腔的憤怒悶在心裡。

貪得無厭的楊掌高，從農民身上霸占去大量土地後，就通過收重租、放高利貸、雇長工等手段，來進一步吸吮水墩農民的血汗。這樣，他的家業就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來越富。經過二十多年的盤剝，他就從一個咸魚攤販，變成了一個占有三百多亩土地、三十多間房屋的地主了。讓我們看看這個“吸血鬼”楊掌高，到底是用什麼手段吸取農民血汗的。

“黑 心 租”

楊掌高的地租剝削，不但租息重，而且花樣多：有“定租”、“分租”、“押租”、“預租”、“小租”、“空頭租”、“抽地另租”和“租地留桑”等等，真是說也說不完。農民總稱它為“黑心租”。“吸血鬼”這一套各種各樣的地租，就好象是插在農民身上的一根根的吸血管，不停地吸取農民的血汗。一九二四年，雇農黃春發向“吸血鬼”楊掌高租了四亩半地，里面再除掉楊家一亩多租地留桑的地，實際只有三亩挂零，“吸血鬼”却硬要黃春發按五亩交租，每年每亩租米四斗，不論年

成好坏，有收无收，一顆也不能少。不租吧，沒有别的出路，春发只得硬着头皮租下来。为了自己能多吃几顆粮，春发真是日日夜夜拼命地做，第二年，眼看地里庄稼长得不错，心里愁悶也解了一半。哪知地主的剝削真是敲骨吸髓，“吸血鬼”看到年成好，賊眼烏珠一轉，又来了个“加小租”的鬼花样，到期后要春发每亩加两斗米的小租；不交，就要抽地另租。天哪！农民一年种两季蔬菜，平常年景，一亩地收入，折米也只有十一、二斗。这点收成，經過他一层层的地租剝削，再除掉抛本落籽花的錢，剩下来的連“吊命”也不够啊！黄春发这一年辛苦，还是落得个借債过年。从蕭山逃荒来的农民徐荣春，向楊掌高租了四亩多地，却要照六亩地交租，楊掌高还要他先付每亩四斗米的預租，共两石四斗。徐荣春一家八口，四个劳力，日做夜做，这年总算得了个較好的收成，每亩收入折米約有两石，四亩多地，共有八石米左右的收入。楊掌高一見哪肯放松，硬要他每亩加两斗米的“小租”，再交一石两斗。如果不交，就要抽地。这样，徐荣春連先交的两石四斗米的預租，共交了三石六斗，除去种子、肥料成本两石四斗，全家一年流血流汗，只得两石米。这叫荣春一家八口怎么活啊！“分租”，也是楊掌高常用的一种租。他的“分租”，低的是四六分、对半分，高的是倒四六分，地主六，农民四，收一季就要分一季的租。再加上大斗大秤收租，这样，他通过各种租，每年就要从水墩农民身上榨取四万多斤租米。

楊掌高出租的土地，不但亩分不足，租金重，而且租地的四周还种上密密麻麻的桑树，这叫做“租地留桑”，是楊掌高地租剝削花样中，更厉害的一种。不但租地四周种桑树占

的地，都要照數交租，而且由于桑树的根生长得很长，农民用血汗錢换来的一点肥料，澆在地里，結果都被桑树吸收去了。再加上桑树长得厚厚密密，地里的作物晒不到太阳，又不通風，就好象断了奶的孩子生了疳积病，焦黃矮小，产量很低。只有楊家的“搖風”桑树得天独厚，由于水飽肥足，长得又高又大，根深叶茂，一眼望去，楊掌高租地四周是墨綠色的一片。就这样，楊掌高一不占地，二不用肥，就可以坐等桑叶的丰收，既为他家养蚕找到了桑源，又为自己經營的“桑叶行”找到了可靠的来路，真是一举数得。蚕市季节时，桑叶价格是十块銀元三担。楊家“租地留桑”的桑树約占四十亩，每亩以收三十担桑叶計算，每年光桑叶的收入就有四千多块銀元。倒霉的当然是农民，仅有的一点土地，經過重重剝削和层层搜刮后，就几乎一无所有了。年年月月，朝朝夕夕，只好白白給地主当牛馬。

如果碰上災荒年，农民交不出租，年三十就只好吃楊掌高的巴掌，听他的罵声，或者眼巴巴望着土地，由他“抽地另租”。每到年关，楊家大厅里总是挤滿了交不起租、还不起債的农民，他們长說短說地希望他能留点情，而楊掌高却总是“吃白食”、“混蛋”地罵个不休。有时他就站起来，把脚一蹬，桌子一拍，算盘一摔，啪啪打来几个巴掌。南水墩的馮阿松，在一九三六年年关，因为交不出租，就被楊掌高这恶賊毒打了一頓；后来，他右手上的两个指头，又被楊掌高的弟弟楊掌文打断了。这冤仇，怎么能忘得了啊！

“断 命 債”

水墩村农民有句話：“铁算盘，的篤响，家里算得空蕩

蕩！”这就是指的楊掌高的高利貸剝削。

提起楊掌高的高利貸剝削，那真象旱地螞蟻一樣，越叮越深，越吸越進，不吸飽血是死也拉不掉的。他放債的利息，真是高得驚人。向他借錢，通常是“五還六”，這是按一年中四個大關——年關、清明、端午和中秋來計算的。比如說，年關借了五元錢，到第二年清明就要還六元，清明還不出，到端午就要還七元二角。這樣利上滾利，推算下去，到第二年年關，就要還十元零六分八厘了，實際上比對本對利還厲害。而且他放債，還有兩個苛刻條件：一、沒有土地和房屋作抵押的，不借；二、沒有中人作保的，不借。有人說：借楊掌高的斷命債，真好比是毒蛇纏身，擺脫不了。村子里真不知有多少人家，被他剝削得家破人亡。蘇發根父子兩代，就是這樣被“吸血鬼”吸得傾家蕩產的。

蘇發根的父亲，原有二十多亩土地，三間瓦房和一間草舍，生活还过得去。有一年遭了災，地里顆粒不收，生活一时困难。明知向楊掌高借債，是口渴喝鹽鹵，但也只得用土地照作抵押，向他借了二十几元錢。哪知，不上几年，利滾利，竟滾到了三百多元，二十多亩土地就无声无息地成了楊家的财产。到了蘇發根手里，只剩下一亩五分地。儿子也逃不出父亲的命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根实在过不下去了，又去向楊掌高借了五斗米，結果仅仅两、三年時間，一亩五分地就被滾得精光，最后，还倒欠楊家六元錢。而“吸血鬼”又硬逼他还这六元錢，蘇發根没办法，只得給他做了四十多天“忙工”，才算抵清这笔債。

楊掌高放債，不但利息高，手段也很毒辣。其中最陰險的一手，就是在押契上要“死頭活尾”的花招。他为了利用高

利貸侵吞債戶的土地和房屋，在立借契時總是這樣寫着：

“茲有×××，借錢××元，因到期無力償還本利，挽中說合，願將所押土地房屋永載割截，永無反悔。恐口說無憑，立此存照。”這就是“死頭”。但他表面上還要裝點“仁義”，在押契的最後，又注上一筆：“限業主×年×月前來回贖，逾期不贖，任憑銀主過戶。”這是“活尾”。表面看是給債戶一點活路，實際上是為了騙得“人心”。借楊掌高的債，利息高，借期短，還期又卡在“年關”或“青黃不接”的時候，誰有能力如期回贖呢！這樣，“死頭”加“活尾”的一張活押契，就成了“絕賣契”。即使有的農民有能力到期去回贖，他也会耍無賴，把地吞沒。這裡就說說農民陳春龍的事吧！

陳春龍，一家四口，原來有三間房屋，五畝地，農閑時做點裁縫活，日子也過得去。可是，有一年碰上了天災，地裡顆粒不收，春龍又生了一場大病，不但手藝活做不來，還東拼西湊，化了一大筆錢請醫生，生活越來越困難。“吸血鬼”楊掌高就乘機表示對春龍關心，常派人去問長問短，並且主動提出願意借錢幫他度難關。當時，鄉親們雖都勸春龍不要上“吸血鬼”的當，可是春龍想來想去，實在無路可走了，最後，只得硬著頭皮，挽中作保，以五畝地作抵押，向楊掌高借了十五塊“龍洋”。誰知，一張紙契，就給春龍一家人種下了禍根。陰險毒辣的楊掌高，知道春龍這個老實人，會想盡辦法如期來贖押契的。他便使了個毒計，用烏炭塗改了日期，再把押契放在灶鍋裡蒸了，然後烘乾，使新的押契看起來就象張舊押契。當春龍夫妻日做夜做，省吃儉用，到第二年年底，湊足本利去贖時，這“吸血鬼”板著猴臉冷冷地說：“春龍，贖期過了，五畝地不能贖了，你還來做什麼！”就這樣

侵吞了春龙的五亩地。

当时，春龙实在咽不下这口冤气，就托人写了张状纸，去告楊掌高。但是“堂堂衙門八字开，有理无錢莫进来”。在旧社会，官府和地主穿的是一条裤，哪有穷人說理申冤的地方。这场官司从乡告到市，又告到省，足足打了一年多。春龙原来准备贖地的血汗錢花光了，三間瓦房和大大小小的家具也变卖了，但是状子仍然一层的被駁下来，“吸血鬼”照样还是逍遥法外。从此，春龙家的生活也就更加难熬了。春龙嫂越想越气愤，心一横，上吊死了。不久，儿子也活活餓死了，女儿跟人逃荒走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逼得春龙神經失常，不多久也死了。

在水墩村，还有楊生佩、沈巧珍、戚光耀等几家，也和苏发根、陈春龙一样，是在“吸血鬼”的高利盘剥下傾家蕩产的。

“买青苗”，这是楊掌高高利剝削中，絞杀貧苦农民的常用手法。他买青苗，一般都卡在过年过节和青黄不接的时候。趁这个“荒口”，用极低的价格，买下农民的“青苗”，并且預定出产量来。到作物上市季节，农民就得按預定数交付，不能如数交付时，还得到市場上去买来补足。如果收成好，那不用讲，都由他收。

“卖青苗”对农民來說，是件非常痛心的事。就拿卖小黃麻、小絡麻來說，卖给楊掌高的时候，才出青苗，誰曉得以后有收沒收呢？再加上那时价格只有八九角伪币一担，万一遇災落空，楊掌高又要农民按当时市价还他（这时一般要二、三元一担），这样农民又要背上一笔“断命債”了。因此，农民連用一个銅錢都是提心吊胆的。可是，楊掌高却从这里发了

財。再拿賣“小叶”（桑叶）來說吧，年關，農民向楊掌高借錢，一担“小叶”只抵五六角偽幣，賣十担“小叶”給他，才只有五六元偽幣。到第二年蠶市季節，農民把桑叶挑給他，他就要賣二三元偽幣一担了。前後只隔三四個月時間，楊掌高就坐得四五倍的高利。特別是到了春蠶上山結茧前五六天內，黑心的楊掌高，就把桑叶價格提高到五六元一担，從中撈取的利息就高達十多倍。有些農民，被生活所逼，向楊掌高借高利貸，等不及桑樹抽芽，就把桑叶賣給楊掌高，這叫賣“白吊”，到時候收成好，還勉強過得去；沒得收，那只好含着眼淚變賣家產，按當時市價買來去還他。從這裡可以看出，“吸血鬼”的高利貸剝削，是多麼凶狠了。

“榨油場”

楊掌高，除了用地租、高利貸來吸取農民的血汗外，在雇工剝削上，也真是使盡了“吸血鬼”的本領。他家雇工，一般有“長工”和“忙工”兩種。

就長工來說，到楊家去當長工，得要有兩個條件，一是身強力壯，二是樣樣農活都拿得起。如果這兩方面都被他看中了，那他就會千方百計地把你引進門。進了楊家門，就等於進了“榨油場”，“吸血鬼”非把你榨得血干油盡不可。在長工還年輕力壯、使喚活絡的時候，楊掌高就拚命叫他們做、做、做，落雪落雨也得干，白天掘地、挑糞，累得筋疲力盡，夜里還得搓草繩、舂小米、喂豬羊和喂蠶。有時，甚至要做到月亮下山，雞都叫了，才肯讓你閉一閉眼睛。一旦血油被榨干了，再不能挑担把鋤了，楊掌高就把他們一脚踢開。在楊家做了幾十年，有的甚至做了一生，最後，還是落得個住破

庙、宿凉亭，病死、冻死、饿死的悲惨结局。雇工沈阿洪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沈阿洪，原是从钱塘江对岸的坍江逃荒到水墩村来的。他为人忠厚，力气也很大，一对大水桶上肩，就象挑灯笼一样轻。杨掌高看中了阿洪，就千方百计地骗他，讲了许多好话，并且答应他，只要好好做，决不会亏待他，工钱可以比别人多，到时候还可以给他讨个老婆，或者就养老在杨家。沈阿洪听信了杨掌高的花言巧语，来到杨家后，真是一心一意起早摸黑地做。他种的蔬菜、黄麻、络麻格外好，培养的桑树特别茂盛，只懂得在地里埋头做活，从没有“游心”，连过年过节也很少休息。杨掌高得到这样一个雇工，地头的心事去了一半。沈阿洪为杨家增添了不少财产。但是，时间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沈阿洪的背驼了，腰弯了，体力也衰退了。他给杨家整整做了三十年，可是杨掌高答应的事却一件也没有兑现。工钱，工钱没有分文；老婆，老婆没有影子。沈阿洪气得吐血，从此就长病不起。杨掌高看到他活不长了，只怕死在家里要赔棺材钱。一天，他包了一包破衣服给沈阿洪作报酬，二话没说就狠心地把阿洪赶出了家门。沈阿洪离开杨家后，住在附近的破庙里，连病带气，病一天比一天加重。在他临死的时候，邻人求杨掌高给他买口薄板棺材，杨掌高却冷冷地说：“哼，哪有钱给他买棺材！”沈阿洪就尸抛荒野，悲惨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给杨掌高当长工，活活地被榨干油、吸尽血的又何止沈阿洪一个人啊！

买“忙工”，这是杨掌高吸取雇工血汗的更厉害的一种手段。有人说，这个“吸血鬼”，贼心肠特别多，什么鬼花样都想

得出。这一点不假，他看到哪种方法吸血多，就用哪种方法。

楊掌高买“忙工”的花样就有好几种：有买整个月的，叫“买忙月”；有买蚕市季节的，叫“买蚕忙”；有买雇主双方两日輪流的，叫“两进两出”；还有买随时使用的，叫“随叫随到”。多的时候，他买的忙工有好几桌。新村的丁友水就因为卖忙工吃够了他的苦头。那时，丁友水的父亲生大脚瘋病，不会劳动，他自己做小販，賺錢的时候少，亏本的时候多。有一年过年，他去向楊掌高借錢，楊掌高开始时故意摆架子，推說銀根紧，不借。丁友水好話讲了几大籬，最后楊掌高才从鼻子里哼出点声音，說：“你一定要借嘛，錢是有，不过要买忙工，你今年借五元，明年开春給我做三十五天忙工；借十元，做七十天忙工。”丁友水一听，吃了一惊，心想：农忙时雇短工，一元錢只能雇一工，你楊掌高买“忙工”，一元錢就要买七工，这真比“五还六”的高利貸还厉害呀！不借吧，家里人正等錢过年，有啥办法呢？只好答应給楊掌高卖“忙工”。丁友水当时卖的是“随叫随到”。丁友水剛拿到錢，人家还在拜年走亲戚的时候，楊掌高就叫他去挑大糞。以后，到了农忙季节，自己地里的农活正忙，楊掌高又来叫他去上工。由于給楊掌高卖了“忙工”，自己地里的庄稼只能眼看着它荒掉，真是“夏天的汗珠落在地主的地里，冬天的眼泪流在自己家里”。而楊掌高这个无孔不入的吸血鬼，却吸饱了农民的鮮血，他住的，用的，穿的，吃的……哪一样不是农民的血汗！

“吸 血 行”

投机倒把，搞商业剝削，是楊掌高吸取农民血汗的又一

种方法。

楊掌高曾以“恒昌协高記”为商号，先后开过酒店、米店、肉店、药材店、杂货店、南貨店、酒坊、織机坊、桑叶行、毛竹行、柴炭行和蔬菜地貨行等十多片店行。各种店号的門牌，占了弄口半条街。水墩村一带的农民，从农产品的出售，生活用品的购买，生产資料的添置，一直到生病吃药，都要受到楊家的剝削。

楊掌高在商业剝削上，只要見哪一样有利可图，就四出奔走，到处钻营。因此无论哪片店、行、坊，所賺的利潤都非常大。象毛竹行，楊掌高在瓶窑一带低价收来毛竹，在水墩一带高价出售，就有三四倍的利可图。米店，从嘉兴一带販来黄糙米，价格六七元一担，而在水墩卖出的“放債米”要十块銀元一担，再加上出卖时，玩一些黑心的花样：燥米加水，淨米加糠，大斗进小斗出，得利更高。还有“地貨行”，向农民收购黄麻，每担只一块銀元左右，而外銷价格是五六块銀元；药材元參，每担收购价格是二三块銀元，外銷到广州、香港一带，要十块多一担，楊掌高就能从中牟取五六倍以上的暴利。

在商业剝削方面，其中最凶的要算“桑叶行”了。楊掌高有自己“租地留桑”的桑叶，又有“买小叶”和“买白吊”买来的桑叶，再加上向农民采购一部分桑叶，这样，附近的桑叶基本上都被他控制了。他在每年快要养蚕的时候，就向农民放空话，說：“今年桑叶长得好，看来，价錢不会貴，大家可以多养点蚕，茧子卖得起价錢。”一些老实农民，听信了他的鬼話，虽然自己没有桑叶，或者只有很少的桑叶，也大着胆子养起“空头蚕”来了，結果上了“吸血鬼”的当。到了蚕将上山

結茧的时候，因为买桑叶的人越来越多，楊掌高就趁机把桑叶价格，突然由一二块銀元一担漲到四五块銀元一担。害得一些养蚕的农民，进退两难：倒掉嘛，眼看亮晃晃的蚕宝宝馬上就要上山作茧，实在可惜；养下去吧，又没有錢再去买桑叶，到头来恐怕連本錢也撈不回。楊掌高每年就从这些养“空头蚕”的农民身上吸血。而有些农民，就因为养“空头蚕”，被楊掌高盘剝得傾家蕩产。

象水墩村里的黃小狗，自己沒有桑树，也沒有养过蚕。有一年，听楊掌高說，叶价便宜茧价貴，养蚕能賺錢。他想自己年紀大了，地里不能挑担把鋤，在家里摸摸蚕也好。于是卖掉两担絡麻，新打了几个蚕筐，又买了几張蚕种，也养起“空头蚕”来了。开始，蚕长得很好，桑叶价格不算貴，只要一块銀元一担，黃小狗还应付得过去。可是蚕一上二眠，食量就越来越大，桑叶也随着蚕的食量的增大而漲价，由一块一担漲到二三块一担。这时，小狗家里的錢已快用光了，而蚕才二眠，桑叶的市价还在日日飞漲，以后日子怎么过呢？他轉念又一想，漲价，总也有个头吧？已經漲到二三块一担了，总不会再漲了，把家里仅存的一百斤絡麻和十几斤元参卖掉，总可以維持到蚕上山作茧。哪曉得，到蚕上山作茧前五六天，楊掌高“桑叶行”控制的桑叶，竟漲到了六块錢一担。他站在蚕筐面前，看着白胖胖的蚕宝宝发呆了。已經断叶半天了，蚕宝宝仰着头，好象在向他求吃。黃小狗是騎虎难下，一时拿不定主意。晚上，他和老婆、女儿商量了一下，决定干到底，把十多亩土地押掉，向楊掌高借高利貸，去买楊掌高的高价桑叶。結果，蚕是上山了，茧也結得又白又大，但是茧卖了，連本錢也撈不回来，买桑叶的債还不出，

押去的土地就成了楊掌高的家产了。后来，由于家底太空，日子一日比一日难熬。不久，黄小狗得了黄胖病，第三年就死去了。日子实在没法过，最后，老婆走了，女儿逃荒去了。一家人，就这样死的死，走的走。楊掌高呢？却从这些破产的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钱财。在蚕市旺季，他的桑叶行，每天总有百把担桑叶进出，刮去三四百块银元的血汗钱。到了下午，就叫伙计楊善章和雇工背着一袋袋的银元，挑着一担担的铜板，存到杭州兴元钱庄去。这哪里是银元、铜板！这是千百个和黄小狗一样的农民的血汗啊！

贼眼狼心的楊掌高，就是通过以上种种残酷的剥削手段，来吸农民的血。这个“吸血鬼”是骗、剥、榨、刮，样样俱全。好像是蚂蟥一样，见肉就叮，叮住不放，把农民吸得个个面黄肌瘦、皮包骨头，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在旧社会，有多少个这样的“吸血鬼”啊！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水墩村人民打倒了“吸血鬼”，翻身做了主人，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光明大道。今天他们正高举三面红旗，以无比的劳动热情，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宁德县的“海霸天”

王步征 張重庆 阮大綸 陈声揚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陸地上有地主恶霸，海上有漁霸。

“海霸天”，是福建省宁德县“黃德順魚牙行”黃承箕、黃承志老板和黃家其他商店老板的总称。黃家从“民国”初年到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台的前夕，一直霸占着宁德灣的海上江山。他們規定：在宁德县境，凡是海水漲到的海港，統統屬於“德順行”；凡是在海上捕魚的漁民，都是“德順行”的“当头”（佃戶）。他們訂立了一套形形色色的租稅和凶狠霸道的“法律”，來實現他們的殘酷剝削，巩固他們的殘酷統治。宁德县的漁民，世世代代都忘不了“海霸天”一手制造的災難。

权傾全县 独霸海港

“海霸天”凭什么独霸着宁德县的所有海港？先打开黃家的“族譜”来看看：黃承箕的父亲黃履剛，知县。黃承箕的长子黃光宇，州判。黃承箕的五弟黃承志，法政大学毕业，宁德县商会会长、第一区伪区长。黃承志的次子黃光周，宁德县伪保安团副官、自卫队队长。还有什么伪主任、伪館长、伪保长，这里就不再抄了。黃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反动势力，还不惜用自己的女儿去勾結有权力的官員和豪紳，不惜用金錢酒

肉去收买籠絡当地的地痞和流氓。黄承志就是用丰厚的嫁妝，把女儿嫁给宁德县伪政府秘书、經征处主任蔡西山的。全县的大流氓陈鼎济，蕉城四城門的流氓头、“桃源里”把头謝友义，都是黄家的席上宾。于是，黄家权傾全县，势焰熏天，連伪县长都得上門叩头。六十多岁的老人連奶忠說：“那时宁德县的衙門就是黄家的衙門，每一任伪县长，一进县就得先去拜見黄家大老爷。”黄家向伪政府承包了宁德沿海的魚稅。他們交给伪政府是“千抽一”，而向漁民收是“十抽三”（即一百斤魚交三十斤）。因为这桩买卖太肥了，当时还有姓馬和姓陆的两家大地主，向伪政府承包南港和碗窑港（共占宁德沿海漁港百分之三十）的魚稅，但經不起黄家用权力压、把头鬧和市場杀价等手段，最后把两家挤掉，黄家一家独霸。于是，宁德沿海东自漳灣、后灣、金蛇头，西到碗窑、飞鑿，南自青山、斗帽、三都，北到七都、八都，都被黄家霸占。黄承箕宣称：凡是海水漲到的海港、糠壳灰能流到的海面，都是属于“黄德順”的；凡是在“黄德順”的海港里捕魚的人，都是“黄德順”的“当头”。漁民在海里捕的魚，必須送到“黄德順魚牙行”过秤、交租、納稅、交售。

再看看黄家是怎样分封子孙、分霸地盘的，黄家的祖宗——当过知县的黄履剛，有黄承箕、黄承志等六个儿子。他們分駐在宁德蕉城、三都、八都、漳灣、飞鑿等沿海集鎮上，開設德順仁記、义記、日記、月記、星記、礼記魚牙行和粮店、酱园行、杂货店，共有七十余家。这些“德順行”和“德順店”，象一只只黑手，控制着全县的漁区；象一条条毒虫吸吮着漁民的血液。到黄家分产业的时候，竟把宁德所有的漁港和漁民当作他的主要财产，連同魚牙行、粮店一起分

为六份，归六个儿子管領。广大群众恨之入骨，便給黃家起了个外号叫“海霸天”。

敲骨吸髓 殘酷压榨

海霸天霸占了宁德县的海港，有国民党反动政府做靠山，有伪保安队武装保护，有伪商会組織做帮凶，公然自定“法律”，訂立陋規，作为“黃德順”行店压榨漁民的依据。这“法律”包括各种租稅、暗碼黑价和交易办法等，构成一部完整的“海皇帝六法全书”。

有道是海有“三重”，海霸天就規定了三种租稅。一种是“海面租”：規定漁民捕了魚得送到“德順行”过秤，扣去百分之三十，叫做“內加三”。第二种是“海堤租”：規定漁民在海堤上打桩挂网，每二十丈长，每年要交德順行六块銀元。第三种是“靠泊稅”：無論是什么地方来的漁船，只要靠上碼頭，都得先交百分之一的停泊費才允許买卖。除了这三种租稅外，在三都澳的“德順日記”老板黃詩仁，还規定一种“定魚收稅法”：規定漁民每一潮水应捕多少魚，应交多少款，不管你有沒有捕到那么多魚，都得交那么多錢。北澳漁民連联屿夫妻俩年迈体衰，子女幼小，捕来的魚常常不够交稅。連联屿要求老板減輕魚稅，黃詩仁說：“捐稅由我規定，抓魚看你本領，你不使本領，我沒有找你算賬，你还找我麻煩！”漁霸的蛮橫使連联屿气得病倒了。正当他病重的时候，黃詩仁还派爪牙到船上逼稅要錢，連联屿的妻子哭着說，“人病得这模样，連抓药都沒錢，哪有錢來交稅呵！”爪牙不由分說，冲到船上夺去了魚网，还說：“老板交代，只要有人有船，就得交魚交稅！”連联屿被逼得无法安身，只好拖着重病

同妻子儿女逃上山去住山洞。这一家四口人沒有东西吃，联屿病又不好，最后只得将自己亲生的女儿卖掉。联屿病刚好，儿子又因为天下雨石洞漏水，被浸得害病死去，剩下老夫妻两个，流落当乞丐。这个三十八户的北澳漁村，象連联屿那样被迫住山洞、当乞丐的就有十三户。

漁民捕了魚，除受“德順行”抽稅之外，还得由“德順行”定价，再由它轉卖给小商贩去零售。漁霸在这里又施行了殘酷的盘剝。在“德順行”做了三十多年司賬的楊紹集說：“老板定了两套暗碼，規定买卖价格，由他統一买統一卖，使卖的人不知买价，买的人不知卖价。”有人要問买卖价目，他們就威胁：“商会定的，你要反对？”漁民們說这是“黑行里的黑价”。就是这样的黑价买卖，到了算賬付錢时，漁民还要再受一次盘剝，叫做“翻算”：“德順行”付給漁民的錢，一元要当一元四角四分；小商贩交給“德順行”的錢，打七点二三折，另外每元还得多付四分錢。漁民受了那么重的剝削压榨，可是卖了魚，还是拿不到現錢，只能領到由“德順行”发給的“駁条”，凭条再向“德順店”买柴米油盐，这叫做“对批”。漁民們說：“我們祖孙三代的生命，都捏在黃德順手里，打魚由他管，吃飯也由他管。”后灣青年漁民翁敏金夫妻，整日風里来浪里去，打了魚，也度不过穷日子。有一次翁敏金捕了十一斤魚，只“駁”回三斤多霉烂的番薯米，两个人吃不上一天，第二天捕不到魚，就挨餓。象这样吃一天餓一天是經常的事。他夫妻俩常年住在破船上，只有一条褲子，丈夫下海捕魚让妻子穿，妻子在船尾做飯让丈夫穿，誰上岸卖魚誰穿。客人来时，丈夫不是圍破网，就是跳下海。老漁民翁取金回忆这些事时，憤怒地說：“天下三山六海一份田，可是那时候，田

沒有我們的份，海沒有我們的份，連山也沒有我們的份，海霸天說，‘曲蹄（對漁民的侮辱稱呼）爬上山，打死不見官。’漁民連生存的权利都沒有，那是什么天下呀！”

“三保”橫行 神權助虐

漁民們辛辛苦苦捕來的魚，為什麼自己不能拿去賣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訪問了蕉城、三都、漳灣等地的漁民。他們訴說當時有一首童謠：“黃太老，有‘三保’，得罪他，無處逃。”

“黃太老”就是黃承箕。這老傢伙是黃家的權威，在寧德有權又有勢。他和他的兄弟子孫，豢養數以百計的爪牙、打手，命名為“地保”“海保”“人保”。這“三保”專門找漁民的岔子，行凶作惡，肆行欺詐勒索。“地保”是分管地域的，“海保”是分管海面的，“人保”是分布在各個行店的打手。這些人，不是黃家的無賴、潑皮，就是當地的惡棍、流氓。他們在寧德沿海各漁港、集市，組成一個嚴密的巡風網，只要哪里違反黃家的“法律”，他們就會向海霸天報告，漁霸立即發出迫害的命令。我們在訪問中，一提起“黃德順”，漁民們就爭相控訴。蕉城區後灣七十一歲的老漁民連金樹，訴說了他一家多次被迫害的慘痛情形：有一次他的父親病了，他急於要把魚賣出去買藥，不料被“海保”看見，魚被沒收，船被封掉，連魚網也被搶去。但事情還沒有了，“地保”黃第五、黃第六到他家裏坐着不走，逼他向“德順行”賠禮認罪。按“三保”的規定，坐一天要供給三餐吃的，還要送兩塊錢。他們一連坐了五天，連金樹實在供不起吃，送不起錢，只得求這兩個“地保”做保人，向老板具結，家裏的東西都被弄空了，漁霸才

允許連金樹再捕魚。

作惡多端的海霸天，有自己私養的狗腿子，又有國民黨反動派公養的爪牙，不僅用霸權、政權，還用神權多方面殘酷壓迫剝削漁民。他們設立的神廟遍及沿海集鎮，什麼“天上聖母”，什麼“玄壇元帥”，還有什麼“福德正神”，他們就用這些“神明”來欺騙漁民，模糊漁民的階級意識，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拿黃家第一房的子孫黃詩裕來說，他在漳灣開設“德順仁記”，一方面籠絡地痞，當上偽保長；一方面蓋起“玄壇元帥廟”，虔誠禮拜，群眾稱他“笑面虎”。我們在那兒訪問的時候，老漁民們聚在燈下談到深夜不散，年滿花甲的江大大訴說了這麼一回事：有一回，他和連金才等四人，因為賣魚被“海保”抓住了，老板說這是冒犯了“玄壇公”，生不受罰，死有大罪。就逼四個人買香燭紙箔到廟里叩頭，求“赦罪”，又罰運了十六船石頭，鋪一條從海灘到“德順仁記”門口的路面，才算罷休。

朱門酒肉 破船餓骨

在舊社會，封建統治階級吮吸勞動人民的血汗，過着窮奢極欲的生活，而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則凍餒交侵，死無葬身之地。每年夏天，漁霸黃承箕、黃承志都要到寧德龍湫寺別墅去避暑。由寧德縣城到深山龍湫寺，有一條山路。大腹便便的黃承箕、黃承志，坐着四人抬的大轎，搖動着芭蕉扇，轎後面跟着一群婢女和提着麻將賭具、食盒的僕人。漁霸們上山後，縣里的偽縣長、地主、惡霸也都被邀上山游宴享樂。冬天，漁霸們住在府第里，整天花天酒地，吃喝淫樂。黃承志一天要飲兩三斤酒，光是吃的魚肉一天要花五、

六块大洋。黄承志一个人一天的吃喝，等于五口之家的渔民一个月的伙食。要是遇到什么节日或喜丧事，更是大肆挥霍。住在黄家旁边的七十高龄的张细愚说：“黄家嫁一个女儿，要花几千块银元，金银珠宝不用说，让我们看见的衣服、被褥和家具就抬几十杠。他家办的喜酒，分官酒、男酒、女酒三种，官酒是燕窝、鱼翅，办一回不知要花多少钱，他们就是这样挥霍着我们的血汗。”

再看看当时渔民的悲惨生活：一九三四年七月，宁德闹旱灾，黄家老爷公子都上龙湫寺避暑去了，就在这时候，漳湾渔民连发金一家十五口，就活活饿死、病死了十口。连发金有三个兄弟，开头打鱼向“德顺行”交售，换番薯米，照市价一斤鱼可以换一斤，可是“德顺店”只给十两（旧秤），后来又一再杀价，只剩下半斤、六两，再后来只能换一些霉烂虫蛀的番薯渣。连发金眼看全家挨饿，只好和兄弟一起下海讨青苔和耳冻菜给家里人充饥。吃了几天野菜，一家老少拉肚的拉肚，浮肿的浮肿，一个个病倒了。饥饿、疾病，没有粮食，又没有钱买药，这日子可怎么过呵！连发金想起上一年底向“德顺行”卖鱼时，还有余钱没有给清，就叫孙儿继春去讨。老板黄诗裕大发雷霆：“没有交鱼还来要钱？”连继春说道：“家里几个人又饿又病，给了钱买药救命！”黄诗裕说：“你一家死光，也不关我的事。”当连继春流着眼泪回到船上时，父亲已经断气了。隔天，伯父伯母也死了。没有棺木，只好用草垫包了扛上山去埋。又过一天，继春的兄、弟、嫂、妹六个人也死了，连草垫都没有，只好把尸体抬上山去软葬了。这时连金发也已奄奄一息，倒在一只破船上，没有医药，也没有人照看；另一条船上倒着继春和三个小兄弟，一个个

餓得不能動彈。當晚刮了大風，連發金和破船一起被狂風卷入海浪里；連繼春兄弟四人，在鄰船漁民救護下才活了下來。這一個夏天，漳灣港的漁民共死去一百多人，有八家絕了戶，五十三口人全餓死病死了。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斗倒漁霸 漁民翻身

儘管海霸天勢焰熏天，統治殘酷，廣大群眾却始終堅持着鬥爭。早在一九二六年底，縣城里的店員工人，聯合漁民、青年學生，就進行了反對封建剝削、反對漁稅的鬥爭。漁民們有三個多月不送魚到“德順行”過秤、納稅。黃承箕、黃承志急得發狂，不惜採取一切毒辣無耻的手段進行迫害。他們一方面依靠反動政權，大抓“左傾分子”，把工人、學生中的進步分子關入監獄，一方面宴請流氓頭子、封建霸頭，聚集爪牙毆打漁民。黃承志還用自己的女兒，去拉攏混入學生隊伍中的壞蛋進行破壞。偽政府、偽商會，又派兵，又下令，強迫漁民交稅。在反動勢力的瘋狂迫害下，這一場鬥爭暫時被鎮壓下去了。但群眾仍然多方反抗，後灣漁民連樹金說：“我家從我祖父一代到我這一代，跟黃德順鬥了一百多次，我賣魚，他來抓，他抓，我還要賣，皮肉被打，骨頭還硬，那年月不鬥爭就難活命呵！”漳灣漁民鄭志鵬，因為不送魚到“德順行”交稅，一天被打過三次；打了，他還是不送。漁霸黃詩裕抓他到“玄壇元帥”廟，要他下跪“認罪”，他不跪，爪牙打他，他仍然不跪，並且冲着黃詩裕說：“我沒有罪，你們逼人打人才有罪！”那時，因為這裡的群眾缺乏組織領導，沒有把黃家反下去，但是，群眾相信海霸天總有垮台的一天。

一九四九年夏天，寧德解放了，黃家的霸權隨着蔣介石王朝的崩潰垮台了。一九五二年，寧德漁區開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蕉城、三都、漳灣、飛鑾等漁區的漁民，怒潮澎湃，紛紛控訴海霸天的罪惡。黃家除了黃承箕、黃承志已死以外，其餘那些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大小漁霸、惡棍，都得到了應得的懲處。黃家幾十座用人民血汗蓋起來的大廈，和七十多家吸吮人民鮮血的魚牙行、商店，都作為群眾的住房、國家企業公司的廠房和辦公地點。黃家散布在七都、漳灣等地的大片土地，也收歸勞動人民所有。

解放後，廣大漁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人民政府採取救濟、貸款、供應物資、修置漁具等措施，幫助漁民發展生產，幫助漁區建設新村，生活面貌和生產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變。漁民們當家作主，充分發揮了生產積極性，特別是當漁民走上公社化這條社會主義大道以後，情況就更不同了。公社漁業大隊有了機帆船；新修建的漁村，共有兩座雙層大樓和九座平房，過去住破船常年在海上飄泊的漁民，現在搬進了陸地上的新居。解放前，一家二十二口人就餓死病死十二口的連紀泉家，解放十四年來，生活不斷改善。連紀泉光榮地參加了共產黨，擔任了漁業大隊的大隊長；他的兒子在中學讀書。過去一年到頭打赤腳圍破網的人們，現在每人都有新衣服新鞋子。在漳灣被“德順仁記”老板黃詩裕毒打致傷的鄭志鵬，公社安排他織漁網，做輕活。一九三四年，一家十五口被漁霸殘害只剩下四口的連繼春和兩個堂兄弟，解放後都成了親。三都北澳連聯岫老兩口，過去被“海霸天”逼得住山洞當乞丐，現在是人民公社的五保戶，受到公社的照顧和群眾的尊敬，人家叫他們“老來福”。老漁民

兴奋地說：“現在的天下，是我們劳动人民的天下，三山六海一份田，样样都有我們的份。如今，生产年年发展，漁民生活步步改善，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給我們带来的恩情，都是集体化带来的好处。”祖祖輩輩遭受深重苦难的漁民們，永远也不会忘記“海霸天”的滔天罪行，永远記住这血海深仇。漁民們深深知道革命果实得来不易，他們决心紧密团結，搞好生产，坚持革命斗争，在三面紅旗引导下，胜利前进。

三大領主的罪惡

刘汉君 吳光旭

长长的堆龙河啊，
唱不尽欢乐的歌，
那历史的巨浪啊，
却卷着悲苦流过。

这是拉薩西郊原拉魯谿卡（庄园）的一首民歌。

原拉魯谿卡在民主改革以前，是拉魯·澤旺多吉二十多个谿卡中的一个。这个仅有三十六戶、二百零六人的小小谿卡，每戶人家，每一个农奴，都有一部血泪史！讓我們通过事实，来看一看官府、貴族和农奴主是怎样貪得无厌，殘酷地剝削和压榨农奴的吧！

从烏拉的生活說起

原拉魯谿卡，共有十七戶差巴（种差地的农奴称为“差巴”，差巴世代都为領主支差納稅），十八戶堆穷（堆穷是沒有差地的农奴，他的社会地位次于差巴）。十七戶差巴共种差地（領主分給农奴耕种的土地叫差地）三百二十五克（一克相当于一藏斗，約二十八市斤），他們要向谿卡出常年烏拉（无償劳役）十六个半，朝朝暮暮在拉魯一百七十五克的自营地上无償地服劳役。遇到农忙季节还要加差，原出一个烏拉的，要出两个。烏拉們在領主自营地上劳动时，連一口冷水也休想得

到，吃的用的盖的甚至农具，都要烏拉們自帶。一年中除年关、望果节等四个傳統节日共放假十天外，其余三百五十五天，不論有病无病都不得缺工一日。缺工一日，交罰銀二十两。白天支差，晚上还得服役。烏拉們裹着破烂不堪的毯子片，睡在谿卡的馬棚牛圈里和牛馬作伴，夜里还得起来喂牲口，看庄稼。即使是逢年过节放假的十天，也不能擅自回家与家人团聚，否則，一晚罰銀一两。

烏拉們从事各种劳役时，监工的皮鞭，就象身影一样寸步不离，稍有懈怠，便要遭到鞭笞。

谿卡自营地上的一切活計，如犁地上肥，开沟打畦，播种澆水，拔草鋤地，收割打場，运粮装仓，等等，都要烏拉們承担。他們除了这些生产性的劳役外，还要抽人为拉魯及各任谿堆（谿堆六年一任，由拉魯指派）从事許許多多非生产性的劳役。如給谿堆打柴，放牧，挤奶，喂狗，看小孩，燒茶做飯，扫屋理鋪……无所不做。甚至拉魯在这谿卡內的那座华丽的別墅，也是烏拉們从一九五七年起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毫无报酬地給他修建起来的。

別墅竣工后，拉魯要谿堆隆旦在烏拉中找个人看守。隆旦即把烏拉次仁罗布叫来，吩咐說：

“听着！从明天起，你給王爷看別墅去，別墅里有三条狗，可作你的帮手。王爷的貴重东西都在那里面，若丢了一根草，哼！……”

种有拉魯的差地，就得听拉魯使喚！次仁罗布不能說一个不字！只好搬进了別墅的大門。別墅里到底有拉魯多少貴重东西，次仁罗布說不上来，可是看守这些貴重东西的重担，就象重重迭迭的雪山一样压在他头上。他連狗窩都不敢住，

牵着三条狗，胆战心惊地爬到別墅門樓的平台上，小心翼翼地守望着。刮風下雨，降霜落雪，白天或者黑夜，都不敢远离寸步。餓了，妻子貢觉卓嘎从家里給他送糌粑来；困了，就偎依着狗，露宿在平台上。

一个夏夜，大雨滂沱。拉魯·澤旺多吉正領着太太带着少爺在別墅里消暑，欢笑声夺窗而出。就在他們作乐欢笑之时，次仁罗布的妻子貢觉卓嘎，痛苦地捧着九个月身孕的肚子，冒着瓢潑大雨来到丈夫身边，一陣陣痛之后，便在平台上的狗窝里分娩了。丈夫将孩子掖在腋下，孩子在阿爸单薄的怀中哭泣；妻子淋着大雨，在狗窝里呻吟。次仁罗布这时想到的不是妻子的痛苦，而是怕拉魯知道，惹下杀身大禍，不等天亮，就悄悄地把妻子和刚落地的孩子送到邻居家中，連水都沒有来得及給妻子端上一碗，便慌慌忙忙地回到狗的身旁。

这就是拉魯給烏拉安排下的生活！領主們的心腸，到了何等慘絕人寰的地步啊！

拉魯不仅用劳役地租剝夺农奴們的剩余劳动，摧殘他們的軀体，而且也用实物地租盘剝农奴們的劳动成果，吮吸他們的血汗。

堆穷扎西卓瑪，一九五七年租种了拉魯五克种子的定額租地，因土质太坏，总共只打了十五克粮食，扣除五克种子和百分之百的租額，交租时加上谿堆的状若青蛙肚腹的大斗一量，最后只剩得寥寥无几的粮食了。这点粮食怎能解救一年的饥腸餓肚？沒奈何，扎西卓瑪只有出去打短工和卖麦秸糊口。

尽管如此，拉魯感到压榨得还不过癮。第二年，又将

她的五克定額地租，改為分益地租。扎西卓瑪這年的產量仍和去年一樣，收穫的十五克糧食分給拉魯一半，再除去種子五克和糶堆的大斗剝削，幾乎是一粒糧食也沒剩下。靠賣麥秸為生吧？不行！連麥秸也得分一半給領主，因為既是分益地，地里的一切收穫都得二一添作五。扎西卓瑪只好抱著仅有的幾束束麥秸飲泣度日了。

這兩種地租在拉魯糶卡共有五百七十四克。拉魯把它當作密密的漁網拋撒在本糶卡農奴們的頭上；同時，也把它當作長長的釣綫，伸到鄰近糶卡農奴們的口中。每年他到底要從農奴的手中奪去多少糧食，這只有拉魯本人才知道。

農奴們說：“比我們脖子還細的，只有餓鬼；比這裡還痛苦的，只有地獄！”

舊社會的差捐比牛毛還多

外差是官府拋進糶卡套在農奴們脖子上的一條无情的催命索。

拉魯糶卡向官府支應的三崗零四升的外差，本應由糶卡領主承擔，可是拉魯·澤旺多吉卻把它全部轉嫁給了差戶。這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在封建農奴社會中，領主的一切負擔最終總是落在農奴身上。

農奴們拋荒土地，撇下子女，去為官府運輸各種貨物：青稞、酥油、羊毛、柴草、茶葉……官府需用的一切東西，哪一件哪一樣不要他們去運送！就是官府的一封信、一句話的傳遞，都離不了他們的奔跑；官員外出時，要他們牽着馬繮往返跋涉于驛站之間。路要他們平，橋要他們架，東噶宗養的羊子還要他們去剪毛。更荒唐的是，宗政府駐曲利金驛

站头人烏金仁增，还要他們去为他燒茶做飯，捧湯端水……甚至原西藏地方政府雪列空的副业生产也得他們去搞，这就是所謂的“綏若”差，差巴們要輪流到东噶林卡和然巴拉去牧放牛羊。总之，官府需要干啥，就得干啥，什么时候需要，就得什么时候去，要多少人，就得去多少人，不能稍有迟疑，不能打一点折扣。

究竟要出多少天外差？没有一个农奴能說出个确切数字。根据拉魯谿卡的不完全統計，一户差巴每月至少要出十二人天，每年年关前的两个月几乎每天都要出去。由于地里的收获被領主的地租和債主的高利貸盘剝一空，大部分差民通常是餓着肚子去为官府支差，他們背上背着沉重的馱子，挨戶乞討着出去，沿路要着飯回来。在支差中，如果稍有怠慢疏忽，还要遭到头人們的呵叱鞭打，甚至罰款。

差巴洛卓加錯，有一次和巴桑、扎西二人到然巴拉去支“綏若”差时，一头牦牛从山上滚了下来，摔折了腿。牧場“德巴”（管家）便要他們三人按全牛价賠償。賠吧？沒有錢！不賠吧？“德巴”饒不了命！他們三人一再要求減免，最后还是罰了他們五十兩銀子的医治費，和一百五十个鸡蛋，才算了結。

农奴成年累月无偿地为官府及谿卡領主支差服役，但是，这还不能完全滿足那些領主們的貪心，他們又別出心裁地捏制出許許多多离奇古怪、駭人听聞的捐稅差費来。

当孩子剛剛脫离母体，就得赶紧去向隶属的主人报告，拖延不报，就要罰款。凡堆穷戶添人进口，要交銀一两，这叫做“出生稅”。农奴活一天，就得交一天“人头稅”，每人每年少者交銀七两五錢，多者要交四十两，数目多少，由主人

任意决定。农奴死亡，要交“除名税”。比如铁匠吧，要把四种主要工具：锤子、扳子、钳子、火剪，交给所属领主，并要献哈达一条（价银八两），请求除名。

在封建农奴制度的社会里，有什么东西是属于农奴的呢？没有！连山上的融雪流下的水，也是领主的。在这里，农奴们需要引水浇地时，要等拉鲁的自营地灌溉之后，才能轮到农奴。放水之前，要向谿堆献哈达一条，送鸡蛋五个，这叫“放水捐”。

从事手工业的人，每年要向拉萨雪列空交“手工艺捐”藏银四十两。

山上的水有主，那么蓝天也有主吗？有！不管差巴或者堆穷，只要你家的炊烟冒出来，升到天上，就得出捐税。不过这种捐税是用劳役代替罢了。每户每年要支三十人次左右的差，给领主或宗政府修路筑堤等。

养鸡，要上交“鸡蛋捐”。每年要交多少？不一定。这要看宗政府设在曲利金驿站的头人，什么时候要吃鸡蛋，只要他馋了，一张文书，凡养鸡者，都得交鸡蛋。

宗政府的牲畜没草吃了，拉萨雪列空缺柴烧了，公文发到谿卡，不论种地多少，每户交草两驮。这叫做什么捐税呢？农奴们不知道，官府也不说明，权且叫它“柴草捐”吧！

农奴年幼不能支差者，要交“免差捐”。凡十至十五岁的农奴，每年要向谿堆交银三十五两；如果是差巴女儿，要嫁给堆穷，除照例交人役税外，也要出这种“免差捐”，交银四十两。

每逢拉鲁来到别墅游玩，每户差巴还要交“孝敬捐”。

农奴阿乃说：“旧社会的税捐比蝎子还毒，比虎狼还凶，

比牛毛还多！”

在这种情况下农奴們要想活下去，只好向高利貸求援了。

高利貸永世还不清

在烏拉差役、橫征苛稅的殘酷剝削下，在农奴們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在土地等待下种的时候，債主来放債了，利息是借五还六，有时还是借四还五呢！而且，借債的人必須有差地作押；債主还要事先查詢你的差地的地址四至。农奴們在借債之前，要先备哈达一条，每借一克粮，要向債主送鸡蛋一个；借債多的还要奉送各种蔬菜、肉类。

农奴們說，高利貸象毒蛇，纏住就脫不了身。借了債，就失去了自由。自己播种的庄稼，自己无权收获。

秋收前，債戶們得先請債主派人来监收，如果債主不派人来，即是麦子焦掉了头，債戶們也不敢擅自动镰收割。当債主騎着高头大馬来到谿卡时，債戶們胆战心悸地領着他們，来到自己的差地旁，債主儼然以主人的身份，查看了債戶的所有庄稼后，指定长得最好的庄稼还債。收割后，一捆捆麦子或青稞垛了起来。債主指示債戶在麦垛上抹上一层稀泥巴后，債主就在上边打盖上木印加封。直到打場，債主再派人来时才能开封。

打場的时候，債戶們把債主請来，在麦場的一角，摆上矮桌，座垫，备上青稞酒，酥油茶，等等，請債主监督打場。待債戶們把粮食篩簸干淨，装进牛毛袋子里縫好之后，債主在袋口上打上火漆，盖上手章，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張卷折的粗毛边紙看看，伸出指甲很长的手指，撥动着比寺庙里的大佛珠还大的算盘珠——农奴們称它为“催命珠”，眉头一

皺，說：“今年又沒还清。”債戶們有苦難言，只能說一句“拉來索！”抹把汗，還得把糧食背運到十幾里以外的倉庫里去。

“邊打場，邊還債；糧食光，債未清。”

這首民謠，就是舊社會里農奴生活的寫照。

差巴丹增，曾借過債主十克種子，利加利，利滾利，一直還了十五年，最後，把十克土地的全部收穫一粒不剩地交還給債主以外，竟還欠下一百多克糧的債務！

債主可以私設公堂、監獄，隨意對債戶施行審問、扣押和鞭打。差巴洛卓加錯，那年因收成不好，欠債多，還得少，全家勒緊腰帶，借了新債還舊債，先後還了三次，才還了四十二克糧。可是債主的狗腿子逼上門來，硬要他在八天內把共餘六十克欠債全部还清。他因無力償還，被關到糧倉下面的監房里押了兩天，不給吃，不給喝。經多方求人送禮，債主才答應还清債後將人釋放。洛卓加錯賣了兩頭毛驢、一匹馬，還不夠頂債，只得忍痛把正在吮吸着乳頭的小牛犢抱開，賣掉了大乳牛。

債戶們被累累債務壓得喘不出氣，直不起腰，有的債戶只好離鄉背井，逃亡他鄉。甚至有人在債務的逼迫下，破產死亡。一貧如洗、債務累累的老差巴旺扎，在妻子因飢餓患病死亡以後，自己就沿鄉乞討，不久也活活餓死在債主門前！

不管債戶們逃亡、破產或者死亡，毫不影響債主的利益，債務也不會因此勾銷，債主強迫把債務加到其餘債戶身上。

諺語里這樣說：“頭髮再多也能數盡，高利貸永世也還不清。”這個谿卡的十七戶差巴，百分之百的負債，他們還了幾

十年，几輩子，到民主改革以前，还負債二千六百七十克粮和一百三十三品銀子。

农奴的人身依附

农奴在經濟上被盘剝得一干二淨，政治上也是毫无权利的。“溪水可以任意奔流，农奴沒有行走自由。”在封建农奴社会里，誰沒有人身依附？农奴們要向自己的領主交納一定的貨币或实物代替差役。这种人役稅，标明了他們对領主的人身隶属关系。

差巴們的人身为領主占有，世世代代被束縛在差地上。領主可根据需要有权把他們从这里赶到那里。

在这个谿卡的十七戶差巴中，有十戶是被拉魯从后藏、山南等地他的其他谿卡里强迫迁移过来的。拉魯对自己的差民，可以任意懲罰。差巴普布赤达的母亲仓木觉，在十三年以前，被迫从故乡迁来拉魯谿卡，因憤懣郁闷成疾，精神失常，拉魯就随意把她流放到澎波地区的波諾谿卡。后来，她不屈，又逃回来，被拉魯的代理人、狗腿子谿堆色比·頓珠罗布看到，立刻差人抓了起来，铐上脚镣，用皮鞭暴打过之后，关押到谿卡的监房里。后来，亲友們又是送礼，又是求告，才把她釋放。待人把奄奄一息的仓木觉背出监房时，这才看見她那被鞭打的伤口上，竟爬滿了蛆虫。

由于人身依附，农奴們的婚姻也受到限制。差巴群米的女儿登珠澤仁，爱上了附近古魯谿卡的差巴扎西頓珠，結婚以后，被拉魯知曉，便派人逼迫登珠澤仁立刻回谿卡，活活拆散了这对年輕夫妻。后来，群米向拉魯苦苦請求，一直拖了两年，拉魯才允許他将另一女儿到古魯谿卡对换扎西頓珠。

另一个农奴阿奴，和这个谿卡的堆穷阿乃结婚后，为了能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含泪忍痛将三岁的女儿留在当巴省康贖换了自己。

农奴在生活不得温饱，人身不得自由的情况下，只有一条出路——逃亡。据说，拉鲁谿卡在历史上曾有过三十几户差巴，差巴逃亡后，最少的时候只剩下七户。但是，他们仍然逃不脱奴隶主的压榨。

二十七年前，那时普布卓玛才十四岁。一天的拂晓，阿妈带着她和姐姐，逃出了谿卡。母女三人，担惊受怕，逃到了日喀则，在朝阳的墙角下，找了个栖身之处，开始了乞丐生活。

不想，有一天普布卓玛在大街上乞讨时，被出差到日喀则办事的拉鲁的管家边巴看到，象鸱鹰抓小鸡似的抓住了她，强迫她回谿卡去。普布卓玛已很懂事，当时表示同意，事后悄悄跑到阿妈那里，天真地对阿妈说：“阿妈，管家还不知道你在这里，让我一个人回谿卡受苦好了，你就别回去了。”阿妈摇摇头，她怎能忍心母女分离。只好带着两个孩子，跟着管家又回到谿卡。

堆穷们不受领主差地的束缚，情况是否会好些呢？

让我们看一看堆穷阿乃一家的遭遇吧！

铁匠阿乃，故乡是后藏。他因生活所逼，流浪到这个谿卡里来，在各种税租差役的盘剥下，生活十分艰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借了十六克粮食，买了两条猎狗，父子三人就到娜日山里打猎去了。

第一天，打到了三只獐子，当他们正高兴地往家走时，山脚下的大路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官府的人，他们不问青红皂

白，凶狠地将阿乃三人用绳索捆绑起来。

“走！到东噶宗去！”

阿乃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官府的人不耐烦地告诉他：山是拉鲁的山，也是宗政府的山，山上的草木石块、飞禽走兽，都是有主的！就这样，宗政府不但没收了他们的猎物、猎枪和猎狗，还把他们父子三人在监狱里关了七天，最后判决罚藏银五十品，羊两只，才把人释放。

在封建农奴社会里，天是领主的天，地是领主的地，哪有农奴的出路？什么是农奴的自由？拉鲁·泽旺多吉经常对他的农奴们说：“命，是属于你的，可你，则是属于我的。生杀大权掌握在我手里。”这何止是拉鲁一个人的语言！他的话，不过更加赤裸裸地暴露了三大领主（封建领主阶级分为封建政府、贵族、寺庙三大领主）的狰狞面目罢了。

人 狗 之 间

农奴们愤懑地说：“在旧社会里，我们的生活还不如领主的一条狗！”

谿卡里豢养了三条大黑狗，为的是给拉鲁看守别墅。在农奴没有豌豆糊糊充饥的时候，三条大狗照例是喂糌粑，而且还派了个乌拉专门侍候它们。乌拉次仁罗布在饥饿的时候，不得不忍辱和狗争食。谿堆色比·顿珠罗布还养了一只哈巴狗，每顿吃食时，竟要请到客厅里，坐到花座垫上或小桌上，乌拉们揉好糌粑团和熟肉块一起放到它面前的花碟里，供其享用。

至于说到狗的主人拉鲁，当然比狗的生活还要奢侈。拉鲁住在拉萨，好饭好菜吃腻了，有时想吃点新鲜，在秋收前，

竟要吃一吃新鮮豌豆、蚕豆和青麦粒。差巴們頂着日头，忍着飢困，到地里一穗一穗地挑选粒飽的小麦穗，选摘綠胖的蚕豆和豌豆角，还得一粒粒一顆顆搓剝干淨，送到拉薩他的官邸里去。

农奴們則不管丰收歉收，每年都在飢餓綫上掙扎着。

那是二十七年前夏季，正是青黃不接的时候，差巴群則拉姆家早已断炊。她已欠下七百多克粮食的債務，再也借貸无門了。飢餓使她患了严重的浮腫病。邻居們可怜她，口挪肚省，給她送来了一把糌粑、一个鸡蛋和一小碗青稞酒。

儿子格桑巴珠和阿媽相依为命，但却不能守着患病的阿媽，每天早起，他照例得到拉魯地里支差。他在地里劳动时，自己忍着飢餓，吞着酸水，背着监工，摘了几穗青稞，揣到怀里，想回去搓一搓給挨餓的阿媽吃。好不容易挨到天黑，他匆匆回到家来，叫声阿媽，沒有应声。阿媽蜷縮在墙角下，已与人世永別了。

他看到阿媽身旁的那一小碗青稞酒只喝了几口，一个破碗里盛着已經揉好了的糌粑团。看来，这是阿媽临死之前，忍飢留下給支差去的儿子吃的。可是，儿子哪能忍心吃下去呢？

过了不久，格桑巴珠竟和母亲害了一样的浮腫病。在繁重的烏拉差役折磨下，一年之后，这个三十岁的汉子，也倒了下去。

这就是农奴的生活，这就是农奴的命运！

在三大領主的殘酷压迫和剝削下，象群則拉姆母子那样命运的何止万千！拉魯谿卡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一个不完整的縮影罢了。

穷人头上的四把刀

苏尚礼 吴 让

“七寸子蛇最毒，毒不过楊耀堂；黃連最苦，苦不过当长工。”

“粮食上了場，楊家滿仓粮；穷人餓断腸，含泪去拉賬；一进楊家門，穷人苦断筋。”

这些民謠，正是宁夏同心县山区人民痛苦生活的写照。

提起石塘岭恶霸地主楊耀堂、楊子英（回族）弟兄俩，同心地区回汉两族人民真是咬碎牙，恨入骨。他們吃劳动人民的肉，喝劳动人民的血。在石塘岭这个小山庄里，就占有三千五百多亩土地，占全村总耕地面积近一半，附近的白家塬头、月家川、拓家紅灣、邱家坪和下馬关还有他們三千七百亩地。楊家有三十头耕畜、一千只羊，在下馬关开着油坊，还開設大商号放債，每年雇二十个长工，一百多个短工，地主老婆还有丫头、“小跑”伺候着。

同心民謠里还有这样一句話：“楊家一手遮了天，穷人有理对誰說？”为什么楊家能一手遮天？翻开楊耀堂的家譜看一看：楊耀堂的祖父楊文福就是个坑人害人的大地主；他父亲楊百虎当家，剝削人的手段更加毒辣。楊百虎是馬匪鴻達的忠实走狗，靠着馬匪的势力，当上了伪宁夏省政府参議員，还跟馬鴻達的叔叔馬福寿互相勾結，操纵着盐池、同心、西吉、海原、固原几县部分地区的經濟命脉，从中榨取了数不清

的暴利。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劊子手有钱又有势，就连盐池、同心两县的伪县长都得听他的，有一个姓杨的伪县长就心甘情愿地当了杨百虎的干儿子。杨百虎的大女婿是伪中宁县县长，二女婿马绍武（解放后被处决）是宁夏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大儿子杨耀堂是伪乡长、伪县参议员，二儿子杨子英是反动地方民团少校大队长。大地主杨耀堂兄弟和官府、民团、土匪、大投机商，紧紧勾结在一起，数不清的罪恶事实就出在杨家门里。

杨家的发家史，也就是千万个贫苦农民的血泪史。杨家的地租剥削、雇工剥削、讹兵款、商业投机，是架在农民头上的四把刀子。

“死租”杀人不见血

杨百虎从他父亲杨文福手上接下来的是成片的土地，大量的租户，一箱箱的债券。在这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的地方，杨家用杀人不见血的“死租”残酷地剥削佃户，这是农民身上的第一把刀。不管地里有收无收，每年都得交够地租，一季交不上就一翻十、十翻百。佃户交不上地租、还不清债务时，杨百虎就说：“没钱有人呢，没人有土呢！”一些老年人，至今还记得他这一句血腥味的話。杨耀堂从他爷爷、父亲手中接过那架在农民头上的“四把刀子”后，他那吃穷人肉、喝穷人血的胃口也更大了。他爷爷杨文福死后，他扩大产业的第一步，就是搬出旧账，对佃户进行清算，农民一张张的地契锁进了杨家的铁柜，一块块土地插上了杨家的地界石。

农民马登河逃荒回来，用拉账受苦拿到的几个钱买了一头驴，杨耀堂看见后，就抱来一本账，算盘一响，这头驴就

成了楊家的了。嶮岷村农民楊文保租种楊百虎的地，連年大旱沒收成，他只得給地主扛长工頂賬，全家人一年累得腰痠骨头疼掙的几个錢，还頂不上地租的十分之一。楊耀堂在这些农民身上再榨不出油水了，就恶毒地霸占他們的妻女來頂債。例如：楊文保的儿媳妇被楊耀堂搶去抵地租；康家灣村的农民康学义还不了楊耀堂的債，楊家就把他女儿搶去頂債；邱家坪王玉林的侄女也被楊家搶走了……搶人頂債这一手，是楊家的“傳家宝”。

长工血泪沒处訴

楊耀堂的第二把刀子就是雇工剝削。楊家每年收七万多斤粮食，有一万斤是佃戶們交的租子，每一粒粮食都沾着雇工和佃戶們的血和汗。楊家男女老少，不流一滴汗，却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他們住着五处院落，有两处在石塘岭，三处在下馬关。楊家十六口人，光粮食平均每人就占有四、五千斤，而长工們終年受苦却挨餓受冻。地主用穷人的血泪，积成了他的万貫家財。

楊耀堂雇着二十个长工。每个长工名义上每年有二十多元工錢，可是錢到不了长工的手，就被折算光了。长工楊百昌在場上借給一个农民一把驢料，地主楊耀堂知道后，把他打得死去活來，在炕上躺了三个多月，几乎送了命。張三娃的父亲当长工累死了，三娃又接着給地主扛长工。苦了春夏秋三季，一天，他叹着气对伙伴們說：“冬閑了，該叫咱睡个足觉了！”老长工們听了，告訴他說：“傻孩子，扛长工哪一天都一样，冬天，地主折磨得更凶！”冬天到了，地主楊耀堂、楊子英这些吃人的狼，两三个老婆圍着，丫头、“小跑”伺候

着，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屋外，北风刮着，大雪下着，冰天雪地里，长工们光着脚，没日没夜地打场，把一袋袋的粮食背进地主的仓房，长工马进全的双脚就这样冻成了残废。有一天天刚亮，杨耀堂穿着绸棉袄、缎坎肩，外套狐皮长袍，头戴獾皮帽，脚穿毡鞋，大摇大摆来到场上，气势汹汹地对着长工大骂，嫌长工们干活干的慢。在收割季节，杨家还要雇一百多个短工。长工、短工们顶着太阳流着汗，累死累活地干，杨耀堂还看不过眼，亲自骑着枣红色的大骡子追趟。哪一个雇工干活稍微慢一点，就遭到他没头没脑的鞭打。这时候，杨子英带领的民团也下地监工，任意打骂雇工。田野里一片哭叫声，地主和狗腿子却在得意地狂笑。

在地主的眼里，长工的万代子孙，都应该是他的奴隶。长工田子云的老婆生了一个男孩，一些受苦人都来道喜，地主杨耀堂的老婆却对田子云说：“你养的儿子，赶快长大吧！好给我儿子拉西当个伙计。”气的田子云半晌说不出话来。

斃兵款骨里榨油

杨家的第三把刀子是斃兵款。杨耀堂靠马匪鸿远的势力，借派兵款的名义，榨干了穷人骨头里最后一点油。有一次杨耀堂对长工杨百昌说：“给你派一百元兵款。”杨百昌向他诉说自己的苦，可是狠心的地主却说：“已经把你的地折过来了，不够的钱再从工钱中扣除。”杨百昌没了地，还得扣工钱还这笔债。旧债未了，第二年又要兵款，开始时让他交四斗麦子，杨百昌白天给地主杨耀堂干活，夜里又给另一个地主拔麦子，整整五天五夜没合眼，好不容易挣下了四斗粮食，可这时杨耀堂见麦子贱了，又不要麦子，偏要钱。杨百昌被逼得

沒法子，就領着孩子、老婆逃到三營鎮。天下烏鴉一般黑，在那個世道里，窮人到哪儿都受壓迫。他給三營的一個地主拉駱駝，受了兩年的苦，攢了幾十塊錢買了頭驢，又回到了石塘嶺。腳跟子還沒站穩，楊耀堂帶着狗腿子就用盒子槍對準了他，惡狠狠地說：“兵款我墊了，這回你跑不脫了吧！”巴掌象雨點一樣打在楊百昌的臉上。晚上，一頭驢、一條被、一條毯都被楊耀堂搶走了。

商業剝削重又重

楊耀堂的第四把刀子，是借馬匪鴻遠的勢力大搞商業投機，盤剝窮人。楊耀堂在下馬關開大商號放債，囤積皮毛、糧食；在天津、上海開坐莊；跑平涼、西安、包頭等地投機倒把。楊耀堂僅油坊，每年就剝削四、五百塊銀元。他說：“這只是女人的針線錢。”從楊耀堂的父亲楊百虎起，楊家幾乎壟斷了當時韋州、下馬關、預旺、同心等地的皮毛商業。他們每年收購二十多萬斤羊毛，每百斤毛用十塊銀元買進，運到包頭、西安等地，用四十到五十元出售；每年收購兩萬張二毛皮，每張以一元收進，運到外地賣四、五元。這些羊毛、二毛皮是從哪里來的呢？就是在每年三、四月青黃不接時，農民急着用錢買糧，他們壓價收進的，廣大勞動人民一年到頭辛勤勞動得來的一點收入，都流進了楊家的錢莊。

楊家還有最毒的一手，就是捏住窮人脖子放“要命糧”。在每年青黃不接時，楊家大放糧食眼。四、五月里放一斗，兩個月後還三斗，每年春季楊家放出的糧食只有五十多石（每石五百斤），收回來的却是一百五十石。窮人們還不出“要命糧”時，只得給地主當長工。

太阳出来满天红

紅軍长征时，楊耀堂糾合同心、預旺等地区的恶霸地主，用刺刀、皮鞭逼着近一千名民工，在石塘岭修建一座宫殿式的寨堡，妄想阻擋紅軍北上。修了很长时间，这座寨堡打起了三面牆，搭起了两座炮台，这时紅軍来到了同心，解放了石塘岭。楊家兄弟和反动民团夹着尾巴逃跑了，民工被紅軍解放回了家。穷人和紅軍比骨肉还亲，給紅軍送水、找住处、介紹情况。大家欢天喜地相互傳告：“紅軍来了，我們不受苦了！紅軍来了，我們不交租了！”当时为了抗日，紅軍暂时离开这里北上了，可是革命的种子留了下来。紅軍临走时給庄上农民留下話：“地主再干反革命反人民的事，以后絕不饒他！”穷人知道有共产党有毛主席有紅軍，总有一天要出头。他們开始斗争了。紅軍走后，楊耀堂回来了，又抓农民繼續修寨堡，許多农民不去，抓去的也跑了。在地主、保长逼得紧时，老长工楊百昌、虎保仓說：“你小心点！再修寨子，紅軍来了砍你的头！”“再干反革命的事，紅軍要你的命！”地主胆怯了，这座精心筹划的寨堡終于沒有建成。三十年过去了，沒修成的破寨子仍然存在，这是地主阶级鎮压人民的铁证，也是蔣馬匪帮和地主阶级被消灭的铁证。

一九四九年十月，太阳出来了，当年的紅軍回来了！一九五二年石塘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斗倒了地主楊耀堂、楊子英，农民伸了冤报了仇。楊耀堂被依法判处了无期徒刑，反革命分子楊子英也被法办了。穷人翻了身，做了主人。过去受压迫受剝削最深的长工，現在生活得都很好，那个被楊耀堂逼得走投无路的老长工楊百昌，貧农、下中

农社員，选他当了大队的貧农、下中农委员会的主任，他常说：“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要跟党走到底！”那个被楊家折磨得殘廢了的长工馬进全，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照顾下治好了病，現在身体健壮，劳动积极。他說：“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这穷汉早就沒命了！”长工田子云的儿子田来华現在已长大成人，担任石塘岭大队的团支部書記。公社化以后，石塘岭是窑山公社的一个大队，社員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紅旗，在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

血泪話祠堂

張希賢 刘仁双 李志安

有些青年人說，在农村看到一些祠堂，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这是怎样建起来的？修起来又是作什么用的？現在有人还想修祠堂对不对？还有的人，分不清階級界限，讲家門宗族关系，和这些問題也是有关系的。我們在湖北省通山县燕厦区对王氏宗祠作了一次調查，看看这个調查，以上的問題，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通山县燕厦区有九千多戶，王姓占了三千二百多戶。王姓在燕厦区不仅是大姓，在通山县也是大姓。王氏家族在燕厦区有一个总祠，叫“洪公祠”。这个祠堂又分“上三支”，“下三支”，六个“甲头”。轄有盛公、京公、云公、能公、正公、拒公、师公、文公、法远公、胜万公和衡公等十一个分祠。这些祠堂由王华然（伪清乡团长，伪区长，恶霸地主），王国华（伪乡长，恶霸地主），王更新（伪省参議員，匪軍团长，恶霸地主），王鸞凤（大地主），王潤生（伪乡长，恶霸地主），王作民（伪联保主任），王瑞光（伪县参議員），王万彩，王文林，王洁之（都是保长、地主）等人分別任經管、族长、督修、公会会长。

修祠續譜祭祖无異几支大吸血管

洪公祠是什么时候修起来的已查不清了。大家只知道这

个祠堂在解放前是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其他分祠是两三年一小修，四五年一大修。一九三七年恰好是洪公祠大修之年，第二年接着續譜，过两年又搞什么开祭。那些恶霸地主、官僚劣紳，以修祠堂、續譜为借口，大肆宣傳“不修祠堂是不孝祖宗”，“水有源头，树有根本”，“上为祖宗，下为儿孙”，“千金难买一个姓”，“亲不亲一家人”，用这些宗族关系来欺騙同姓的劳动群众，榨取他們的血汗錢。規定凡不出錢的不准进祠堂，不准姓王，还要捆进祠堂，綁上大柱，严惩示众。

修祠堂、續譜、开祭像几根大吸血管，把許多同姓农民的家产錢財搜刮得一千二淨，逼得他們傾家蕩产、妻离子散！

現任洪港公社党委书记王定旺同志告訴我們，封建头子借修祠堂为名进行殘酷剝削的一件事实：有一年，又說要修祠堂，規定修洪公祠每个男丁要出一元五角錢，修本房的分祠要出四元，續譜每人要出一元，开祭每人要出五角，每斗田又要出六角，那年我家有三个男丁，有八斗多田，总共要出几十元，一律都要銀洋。一个貧农家庭哪有这么多錢呢？我家算是有点田，无奈何卖去两斗田，万幸保了个一家团圆。一些无田少地的人家情况就更慘了！靠卖长工度日子的王义根，一家有四口男丁，听說要出六块錢的祠堂費，急得嚎啕大哭。恶霸地主、伪区长王华然說：“修祠堂是十年难逢的大喜事，錢非出不可，沒有錢我可以借給你，要借多少有多少。不过現在借錢跟往日不同，往日借錢是一年本利平头，現在借錢是三个月本利平头。你借六块錢，三个月还十二块。”王义根听他把賬这么一算，急得站都站不起来。怎么办呢？不出吧，以后姓不成王，还要捆大柱，上吊打屁股。

一家人成了有名无姓的人，将来日子怎么过呢？出吧？王华然的息钱滚得叮当响，不要半年连人都会给王华然滚走！想来想去只有把他最小的一个儿子以十五块钱卖到江西。临走时小儿子抱着娘，娘抱着儿子，娘说：“崽呀！你莫哭，你越哭我的心越痛。”儿说：“娘呀！求你莫卖我，我以后听你的话，听爹的话。”王义根的心也象刀扎，狠着心说：“崽呀！爹娘要卖你不是因为你不乖，怪只怪你错姓了王，你走了，可以救一家人的命，你不走，一家人就会被王华然的利息滚得永世永代翻不了身……”王义根就这样被逼得骨肉分离，卖儿卖女。

恶棍王华然修祠堂发了横财还不满足，又看中了王姓寡妇李紫冬的房子。王华然派李紫冬一元五角的祠堂费。李紫冬缺吃少穿，常年见不到一个钱的面，哪里出得起祠堂费呢？王华然就叫李紫冬把房子卖给他。李紫冬的儿子王定义坚决不卖，对他娘说：“娘！房子一卖我们到哪里去安身？”李紫冬说：“不卖这房子无钱出祠堂费，你姓不成王，以后日子怎么过呢？”娘儿俩一人说不卖，一人说不卖不行，拉扯了几下。王华然听到这个消息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指着王定义说：“好哇！你这歹崽，打娘骂老子的东西，败坏了我王家门风，非送到祠堂打板子，整家风不可。”李紫冬听说要打王定义的板子，她直向王华然求情。王华然把眼一瞪大骂起来：“你这个不懂上下的女人，你的‘家法’不管，我的‘族法’要管。板子非打不可。”他组织一些狗腿子到王家捉人。李紫冬只得痛心地把一间房子卖给王华然，请了五桌酒，出了祠堂费，才算免了儿子挨板子的苦楚。从此，李紫冬一家只有长年睡破庙，住牛栏，到处流浪。王华然看到这种情况，

反而惡毒地說：“李紫冬是個賤婆娘，早聽話把房子賣給我，不是可以不辦五桌酒？”

燕廈區平常田價是：一斗好田可以賣一百多塊銀洋；借錢利息一般是一年本利平頭。到王家修總祠、分祠，以及續譜、開祭這几年中，田價大跌，利息猛漲。一斗好田只能賣五十塊錢左右，利息有四個月，三個月甚至一個月就本利平頭的。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四年中間，燕廈區姓王的貧苦農民因為要出修祠、續譜、開祭錢而被迫賣田、賣地、賣房屋的，欠下大債的，賣兒賣女的有七百多戶。看看這些數字，就可以看出“祠堂”是怎樣修起來的。

“好姓不姓王，年年修祠堂，提起修祠堂，窮人淚汪汪。”在舊社會，“神權”、“族權”，維護和加強了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明目張膽地進行搶奪。農民的田地、房子被他們搶走了！妻子兒女被他們逼得賣的賣了，死的死了！眼淚只有往肚里吞。

修祠堂是地主豪紳十年難逢的“大喜事”

我們再來看負責修祠堂的、續譜的那些地主豪紳長的什麼樣的狼心狗肺。督修洪公祠的惡霸地主王國華，那時又是鄉長，他利用修祠堂和續譜的機會，大肆貪污揮霍，把修祠堂的錢給自己修了一棟三重連五的大房院。農民的錢被他扯空了，祠堂修不起來了，誰也不敢講話，一些房頭族長官官相護，最後的辦法還是找農民開刀，決定每人補出銀洋五角，才算把祠堂修起來。王國祥是譜局局長，他利用“譜費”大放高利貸，把剝削貧苦農民的錢在燕廈區開了一個頂大的

百貨商店，另外还买了可收六十多担租的水田。王鸞凤原来只有四百多担租，在修祠堂和續譜几年当中，他压价买田，高利放債，前后一共买了可收六百多担租的田地，成了燕厦区的头号大地主。劣紳王瑞光觉得有田地还不过癮，他說：“有錢还要有势，有势不愁搞不到錢。”他把那几年修祠堂发的財在阳新县买了一个参議員（燕厦区解放前屬阳新县）。象这样发了財的，买了田地的，修了房子的，当了官的地主劣紳多得很。难怪恶霸地主王华然說，修祠堂是十年难逢的大喜事。可是这对农民來說，却是一場无穷尽的浩劫和災难。

貧苦农民出了錢，流了汗，甚至卖了亲人，丢了性命修起了祠堂，喂肥了地主。我們再来看看这些吃人的魔鬼，他們利用祠堂又来干些什么。

洪公祠有一大套族規族法。提倡姓王的人必須“孝亲敬祖”，篤信什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倫，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規定夫死不能再嫁，夫妻不和不能离婚，婚姻听从父母包办，妇女不能继承父产，晚辈不能犯“长辈”。对貧苦妇女更为刻毒，还規定什么“三从”“四德”。其实族規又何止这些，一个貧农社員說得好，那时“法”在族长和恶霸們的嘴上，他們說“犯法”就算犯法，农民就得进祠堂挨板子。事实上除过打板子外，还有什么燒香賠礼、罰酒席、上吊、滾狗刺、除譜、出逐、挖眼睛以至沉河和活埋。

到底是階級敌人还是所謂“一家人”

王家那些恶霸地主們不是常說“千金难买一个姓”，“亲不亲一家人”嗎？我們再看看“一家人”又是怎样呢？一九二

五年燕厦区鬧災荒，賣了一生長工的王義能，家有五口人，無田無地，加上年老力衰，賣工無人要，一家人幾天見不到一粒米。餓得實在無法，他在地主王會龍的地里挖了幾個紅薯。王會龍知道了，馬上找房頭、族長一商議，這些地主惡霸說，這是“造反”，要過極刑。王義能就被提進祠堂，先打了几十大板，又挖去了兩隻眼睛，最後被活埋在墓洞里。就是這樣地主還不甘心，又把王義能一家人趕走了。貧農王有權是地主王密泉的親侄兒，兩家同住一棟房子，共一個巷道。地主王密泉霸占了巷道，王有權沒法只得再開一個後門。地主王密泉就抓住了這個辮子，在偽鄉長、族長王國華、王華然面前告發王有權冒犯長輩，私開後門，挖斷王姓龍脈，破壞王家風水。王華然說：“王家出了忤逆不孝的子孫，當族長的不教訓，將來還要造反咧！”王有權只得將仅有的六石谷賣了，請了兩桌酒賠禮。地主惡霸吃罷了酒說：“喝酒只能解決不敬長輩的處分，挖斷我王家的龍脈，破壞王家風水，非得到祖宗面前燒三爐香，跪三天，打几十大板才能了事。”王有權不堪忍受這種迫害，偷偷離開燕厦，流落他鄉，一直到解放後才回家。地主常說的“一家人”就是這樣滅絕人性，殘酷無情！事實上，在階級社會里，窮苦農民和地主階級只有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根本沒有什麼同姓同宗的骨肉情誼和甘苦與共的手足之情，“千金難買一個姓”只是地主階級用來欺騙和剝削農民的一句鬼話。過去有多少農民听信了這些話，而受了他們的騙，挨了他們的整。

在舊社會青年男女的婚姻是沒有什麼自由的。那時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在封建地主的族規族法的干涉下，斷送了自己的美好青春，埋葬了自己的幸福，或是忍氣吞聲地混過一

生！

在解放前，有一位姑娘名子叫王长姐，父亲叫王丁順，母亲叫蕭雪姐。长姐的父母包办代替把她許配給阳新县龙港一个叫丘喜田的人。結婚后两人感情很不好，长姐便跑回娘家，要求与丘喜田离婚。那时族长王华然說：“好馬不吃回头草，好女不嫁二夫君，世界上哪有一个女人嫁两个男人的道理。”并且誣賴王长姐的母亲是“养女卖奸”，要捉到祠堂整家規。姑娘受到这样的侮辱便自杀了。地主还不罢休，还唆使丘喜田到他家来要人。王丁順无奈只有一再請客賠礼，还要負担丘喜田来回的盘川，他的七斗多田就这样給地主王华然买走了。王丁順有苦无处訴，有冤无处伸，急得生了一场大病，活活地被折磨死了。剩下蕭雪姐只有带着小儿子到处乞討。几年后，儿子长大了，一些紳士、族长和乡、保长看到王丁順家再没有什么油水可逼，就以一百二十块銀洋将她儿子卖了壮丁。蕭雪姐这个有田有地，有儿有女，夫妻和好的家庭，就在地主阶级的族規族法一次再次地打击下，搞得只剩她孤孤零零的一人，最后也活活地餓死了！

是不是所有姓王的人犯了所謂族規族法，都一样的捉到祠堂治罪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上面所說的那个整得王丁順家破人亡的恶棍王华然的忠实走狗、地主王并生，他为祠堂管賬，貪污吃黑数不清；他霸占人家妻女十多人，被害者上至他的孀娘，下至他的侄媳。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曉。王华然却不說他犯了什么“通奸拐带，霸占人妻”的族法。伪省参議員、恶霸地主王更新，同和自己父亲姘居过的女人陈建蓮結了婚，群众議論紛紛，說王更新是“乱倫”，是衣冠禽兽，王华然不但不整王更新的家規，反

說群众是造謠，是侮辱斯文。他說誰造謠就要送到祠堂上吊打。王华然的族規族法正是保护坏人作坏事的工具。

祠堂成了反共反人民的司令部

燕厦是个老苏区。地主劣紳們一方面死死地維護着那一套反动、腐朽的封建宗法制度，一方面用尽一切力量来鎮压革命的人民。王氏宗祠的一些所謂族长、督修、經管、公会会长，既是国民党的团长、区长、乡长、保长、參議員，又是土匪軍隊的什么清乡团长、联保队长。他們穿的是一条褲子，干的一个勾当。大革命前，王氏宗祠的族規族法的严惩对象一向对着劳苦农民，但名义上却打着严惩偷盜的幌子。大革命以后，他們竟以蔣介石的“宁可錯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办法，对待共产党，把严惩对象公开指向革命的人民。那时，祠堂成了反共反人民的司令部，族长成了反共反人民的司令官。他們組織地主武装，要各族管各族，各房管各房，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員、赤卫队員、革命干部和他們的家屬。我們在車田大队四个生产队統計，四个队一百五十戶，有十三人被地主武装枪杀了，有四戶紅軍家屬被卖了，然后，田地被沒收，财产被搶光。

一九四七年，刘邓大軍南下，这些地主恶霸看到蔣介石的江山垮在旦夕，于是藏起了狐狸尾巴，又在群众面前花言巧語地說，現在大难临头，天下姓王的是一家，要不記恩怨，患难相共。他們还不甘心灭亡，发动組織什么“宗族自治会”，并規定：一、共产党、解放軍来了不准任何人接近他們。二、調查老紅軍的名单。三、組織宗族联防队。据說宗族自治会仅在洪港一带就掌握了四十八个老紅軍的名单，他們計劃一

有风吹草动，就把这四十八人杀掉。可是不久，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铺天盖地涌向江南，全国解放了。那些封建阶级的忠臣孝子，吃人肉、喝人血的地主恶霸横行乡里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从此，多少年来压在人民头上的这座大山被打得粉碎。过去只能是地主、恶霸、劣绅、官僚和他们的子弟才能走出走进的洪公祠，如今有一部分成了人民公社社员的住屋，一部分成了社员子弟读书的学校了。

罪恶的地主庄园

刘 真 刘冬青

这里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是怎样发家的。

汽车急速地向前行驶。出成都，大约走了一百四十华里，就到了大邑县的安仁镇。出安仁镇，继续走半华里，就到了原先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现在是中共大邑县委和其他有关部门举办的揭露地主阶级罪恶的“地主庄园陈列馆”。

一眼望去，整个庄园灰蒙蒙的一片。据附近的老乡说，它的面积有好几十亩田地那么大。庄园四周，全是两丈多高的风火砖墙。庄门坐南朝北，两扇漆黑大门，足足有一丈多高，三寸来厚。门的侧翼两壁，钉有四个拴马的大铁环。两壁上下，均有枪眼。真是戒备森严。

大门头上的横额刻着四个大字：“受福宜年”。冲门进去，是一个竖长的天井。天井里摆着两个六角形的红沙雅石花瓶。这对花瓶约有五尺高，两人不能合围。

天井的左厢是账房。在这里，账簿、账桌陈设得一如既往。右厢是一个八丈宽、六丈深的大厅。厅房横排着抱柱五根。这是当年刘文彩与军阀、恶霸、匪首们休息、赌博的场所。

大厅的左边是刘文彩的西式客厅，右边是中式客厅。中式客厅内，摆着一套紫檀木镶大理石的桌椅。两人并坐一椅，尚不擦肩。椅的周围嵌有闪闪发亮的雕花鱼骨和极珍贵的珍珠。

穿过大厅，又是一个天井。对着大厅的正屋，中间是刘文彩的寿堂，左边是刘文彩的卧室，右边是刘文彩五姨太的卧室。厢房、后房是刘文彩的儿女们住的地方。在他们的卧室里，不仅被子、幃帐、窗帘是丝绸刺绣品，就连床上铺的单子，也是各种颜色的缎子，绣着五彩缤纷的花鸟。仅刘文彩一人的单、夹、棉、皮四季衣服，就有一百二十多箱。

这一大片房子，全被一层圈房包住。刘文彩的住房后面，是奶妈、丫头、大娘、绣花女工的宿舍，也是泡咸菜、放年货、堆香蜡的地方。从靠近眼房的园门穿出，朝着和大厅相反的方向走去，便是粮仓和雇工院。走出雇工院，就是一道夹墙深巷。在这里并排两个人，就很难通过。出了深巷，东拐，西转，几十步一座高墙，几十步一道黑门，才到刘文彩的客房院。从客房院穿过去，是刘文彩的“欢喜楼”。楼顶还有他乘凉观景的阳台。

走过“欢喜楼”，是一个花园。靠花园的一边，是刘文彩的“夏季吸烟室”。他吸烟的时候，除了专有一个烧烟匠替他烧烟外，还专有少女为他打扇子、倒茶。他在这里吞云吐雾，不知吸食了多少人民的血汗。有人粗略地算了一笔账，他每年抽的鸦片，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就需一万元以上。

和“夏季吸烟室”紧挨着，是刘文彩的“逍遥宫”。在这里，他干尽了种种荒淫无耻的勾当，奸污调戏妇女竟达数百人之多。

从这里轉出来，就是刘文彩的灶房。这是一排长达十几間的平房。平房前边是一个斜长的天井。天井的两头各有一口井。刘文彩在这个天井中間砌起一堵墙，两口井隔墙相望。这样一来，刘文彩一家人，用里面的水井，雇工、杂役只能用另一头的水井。

連吃水，刘文彩都分了阶级等第，吃飯就更不用說了。伙食共分四等。刘文彩和他的五姨太吃“特等卫生灶”，家屬吃“总起承灶”，貼心管家吃“小灶”，长工、仆役吃“大灶”。刘文彩除了天天吃山珍海錯之外，还吃人奶泡飯、人奶冲蛋花。每天供刘文彩吃奶的有六个奶媽。

提起刘文彩吃人奶，还有一个含血带泪的故事：

那是一九四八年的八月，刘文彩家里一个长工的老婆罗志英生了孩子。孩子刚一落地，家里就无口粮了。罗志英东借西找，熬出滿月，就背着孩子到刘文彩家里找丈夫要錢。誰知，罗志英剛剛見到丈夫，錢还没有要到手，刘文彩見她奶好，就不准她回去，强迫她住在这里，每天給他挤奶三盅。罗志英在这里待了不到三个月，每天三盅奶是給刘文彩挤出去了，可是她那可爱的嬰兒，却活活地餓死了。

整整用了两个多钟头的時間，我們才把刘文彩的庄园看了一半。陈列館的同志告訴我們，別看他修下了这座可容上千人馬的大庄园，可刘家經常住在里边的，只有刘文彩和他的五姨太、他的大儿子刘元龙夫妻俩、三儿子刘元富和小女儿刘元俊六个人。但是，伺候他們六个人的，仅总管家、管事、烟枪手、奶媽、丫头、厨工、裁縫、綉花工、雇工，以及专门做泡菜的，就有一百多人。

“不仅这样，”陈列館的同志指着对面約半华里远的地方，

指着那参天松柏包围着的又一大片房子说：“那是刘家的新公馆。这片房子占地五十亩。从一九三八年动工，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才落成。房子盖成后，刘家的人并没有去住过，只有一个保护刘文彩的手枪连和一些管家住在那里。”

刘文彩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全部都是剥削农民的血汗。他在这里挥霍着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我们看到这里，禁不住气愤地吐了一口气，好一个无耻的“受福宜年”！

二

看了此情此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们重新走进陈列室，又仔细地看了看刘文彩的财产分布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他有公馆二十八处，钱庄十二处，当铺五处，碾房十处，仓房二十七处，街房一千五百余间，良田一万二千五百多亩。分布在邛崃、大邑、崇庆、温江、双流、新津、华阳、成都、郫县、新繁、新都、宜宾、雅安等十三个县市。

多么大一个家业呀！他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找到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安海山同志，他作了一次比较详细的回顾。

刘文彩的父亲叫刘公占，因为他是个贡生，又名刘三贡。五十多年前，刘公占有二十来亩水田，养活妻子和六个儿子。以后，他的孩子长大了，三个儿子结了婚、成了家，人口逐渐增多，日子过得就不像以前那样富裕。刘公占不满足于那二十亩水田，要发财致富。他思索了很久，才思索出了一条路：“送老六进学堂，将来升官发财。”刘公占的期望没有落

空。沒有多久，老六在軍官學校畢了業，就飛黃騰達起來，成了四川有名的軍閥。真所謂一人得道，雞犬飛升。一九二一年，正當劉文彩四十歲的時候，他就借着兄弟的勢力，上任宜賓的“船捐局長”、“護商總辦”；繼又升任“川南稅捐總局總辦”、“叙南清鄉總司令”。一直到一九三三年，由於軍閥內部矛盾，劉文彩的靠山敗退西康，他在宜賓站不住腳，才跑回安仁老家。

在宜賓任職的十二年間，劉文彩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當他離開宜賓時，利用子彈箱裝滿銀元，大箱二千元，中箱一千元，小箱五百元，滿載二十五只木船，浩浩蕩蕩，經樂山、新津，武裝押運回家。就連那天井里的紅沙雅石花缸，也是從路隔七百多里的宜賓一公園里搬來的。

從此，他就大肆買房、買地，打下了統治、壓榨、剝削農民的經濟基礎。

說到這里，安海山同志屈指給我們數了一數：安仁鎮上有七條街，除一條老街以外，全部房子都姓劉。而劉文彩一人，就占了四條街房。另兩條街房，他還占一半。大邑縣一共五十幾萬畝土地，劉家就占去了二十多萬畝。看吧，一到收穫季節，遠遠近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扛的扛，背的背，挑的挑，推的推，都是給劉家送租糧的。一直要送一個多月。勞動農民，辛苦一年，弄得好了落把谷子，弄不好了就落把稻草。“四方土地都姓劉，顆顆血汗為他流”這句話，一直到今天，這里的農民還沒有忘記。

三

劉文彩的房屋田產，與其說是買來的，倒不如說霸占的

更确切些。从陈列馆的玻璃柜里的一件血迹斑斑的破烂衣服上，引起了一段血泪的追溯。

很早以前，刘文彩这座庄园所在地，是一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庄。刘文彩在宜宾任职时搬回银元，只修了一栋三合头的房子。后来，他丢了“叙南清乡总司令”这顶乌纱帽以后，回到老家，一心想当“土皇帝”，头一着棋，便是扩建庄园。于是他就想方设法，把这一百多户人家赶走了。赶走一户，修一道墙，开一道门；整掉两户，又修一道墙，又开一重门。一直到現在，上了年纪的人还数得出来：大门、厅房的屋基，原是刘义和、刘老玄、长生娃的；雇工院是刘吉盛、刘大姐几户人家的；“欢喜楼”是补锅匠的；“逍遥宫”是刘益山的……一口气能数上二三十户。

一百多户人家的房产被刘文彩霸占以后，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流落他乡，杳无音信。陈列馆的同志，指着那件血衣，向我们倾诉了一段往事：

刘文彩在修“逍遥宫”那座花园时，就贪图刘益山的房子和六亩水田，便派狗腿子刘绍武去找刘益山。这房田，是祖业，刘益山横竖不答应。刘文彩看软的不行，就放出风声，说刘益山通匪，要打死他。刘益山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就丢下老母妻儿，逃往他乡。

刘益山走了，刘文彩就命人开一条大水沟，直冲向刘益山正屋，让水白天黑夜冲刷这座正屋的土墙，逼他母亲妻儿搬家。老母亲吞不下这口恶气，一急之下病倒，不久就死了。

事隔已久，刘益山见刘文彩不再提要房的事了，就转回家来。正是四月十三日，该种稻插秧了，刘益山请了姑妈的

孙儿楊建民和两个朋友，来帮忙插秧。他吩咐老婆去推豆花，自己上街买肉水去了。

誰知就在这个时候，刘紹武指揮一伙乡丁，拉出短枪，把楊建民和刘益山的两个朋友，打死在田里。另一班人馬，到安仁鎮上，抓住刘益山，绳捆索綁，丢进乡公所。后来，还是刘益山在“卖”房文契上按了手印，分文未得，才从死路上拣回性命。

在安仁鎮上，除了那几条街房之外，还有文彩中学、星廷（刘文彩的字）戏院。提起修戏院，这里也有个由头：

那是一九三七年，接近春节的时候，刘文彩对他的六弟說：“你长年在外，今年回家过个团圆年吧！”六弟略带感慨地說：“你們都是房屋一片，我房屋沒有一間，回家在那里插足啊！”

刘文彩听了这段話，急忙向众兄弟宣布：“是啊，六弟終年在外东奔西杀，都是为了我們，可他在家乡連一間房都沒有，我們无论如何也不能心安理得，得給老六修一座宅子。”

各位兄长都答应的很干脆，可是拿錢的事却一字不提。刘文彩坐了蜡。就派专人乘飞机和輪船，从西康向内地販运烟土撈錢。沒有跑几次，他对門的一座新公館就动起工来了。

这座新公館，因为是給他六弟的两个儿子用的。所以并排修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院子。两个大門，两个花园，两个球場，里面的一切建筑，都是同样两套。

为了庆祝这座宅第的落成，刘文彩請了四川最有名的川剧演員来演戏，修盖了星廷戏院。

修盖星廷戏院时，赶走的农户，也是成串成群。刘文彩

今天用石灰圈了地，明天就得动手拆房子。誰要是吐出一个“不”字，禍事馬上就会落到头上。

当时，这里住着一家姓罗的，男的叫罗吉安，他的老婆人称罗二娘。他們有三个儿子，經濟上虽然不怎么富裕，但日子过的很和順。一天刘文彩叫人在他們的屋基周圍撒了石灰，要拆房子。罗二娘可不是个逆来順受的人，就頂撞了他們几句：“刘家的墩子風水好，为啥不把戏院修在墩子上，偏偏来找穷人的麻煩，不搬！”

罗二娘的話，很快傳到了刘文彩耳里。刘文彩馬上叫刘紹武把罗吉安吊在乡公所，又喊潘德成派人去拆房子。罗二娘的娃娃还在床上睡觉，房頂上的瓦块嘩啦啦直朝屋里落。罗二娘丢下房子，去乡公所看丈夫，只見他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真是心疼。她拿定主意，救人要紧，便向刘紹武說：“不論到那里都是住家，把人放了，你拆房子我搬家。”

說起刘文彩兼并土地的事，名目就更繁多了。什么“吃心心田”、“买飞田”、“买官田”，真是名目巧而新。

什么叫“吃心心田”？什么叫“买飞田”？还是陈列館的同志給作了解釋，我們才恍然大悟。“吃心心田”是这样：凡是刘文彩看中了哪家的田，就一心想用低价买下。如果业主不同意，他就先設法买下这块田地周圍的田，从四周把它圍起来。南方的水田是要水来澆，四周的田都是刘家的，他不給你放水，庄稼就不长。这样一来，你不卖也得卖。“买飞田”是这样：刘文彩只要看中了哪块田，可以不通过业主，随便找一个与业主相識的人，代表业主与刘文彩談价錢，訂契約。然后，再把錢和契約交給业主，就算成了交。

大邑附近，五泗乡有一家，只有母女两人。母亲五六十

岁了，为人和善，人们称他孟大娘。孤女寡母就靠着三亩六分水田过日子。不知哪一天，刘文彩看中了这块水田，便用“买飞田”的办法把田夺去。在那有理无处讲的世界里，孟大娘给活活气疯气死了，留下孤女，走投无路，只好进庙去做尼姑。

提起“买官田”那就更残忍了。傅姓清明会有二亩二分好水田，刘文彩的侄子刘元琮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可是无理霸占去，怕激起傅氏宗族的公愤，于是就暗中指示他的忠实爪牙傅德轩，诱骗农民傅平安出名私卖此田。第二年，傅氏族人吃清明会时，傅德轩又趁此机会，诬说傅平安忤逆不孝，盗卖族田，将傅平安身背石磨，沉水淹死。

刘文彩要想霸占农民的田地，有时也竟不立什么名目。现在陈列馆的玻璃柜里，还摆着一大捆刘文彩从川南税局逃跑时，窃走的空白契约和一颗官印。有了这，只要刘文彩心血来潮，愿意占谁家的田，填一张契约，田就马上到手。

四

一个大斗四角方， 佃户眼泪上千筐，
一斗就多三升六， 地主剥削赛虎狼。

随着这首歌谣的启示，我们走到了另一个陈列室。一进门，最先闯入我们眼帘里的，是一排刻有“星记租斗”字样的收租大斗，斗梁上白纸黑字写着：一斗合十三升六。大斗进，小斗出，这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一般手段，并不怎么稀奇。稀奇的是，刘文彩还有一个特制的、底部安有弹簧的斗。刘文彩用这种斗超额剥削的租谷，一年就有三千三百余担。

这里还摆着一架风谷机。这架风谷机也与一般的风谷机

不同。它里面装有鋼珠、鏈子和飞輪，扇起来風力特別大。一石最干最飽的谷子，經它一扇，就只有六七斗了。农民給刘文彩交的租谷，必須用这架風谷机扇过，而且扇出去的“不飽”谷子，还不許帶走。

刘文彩家里还有无数杆一人多高的大秤。一斤十六两，这是妇孺皆知的一般常識，而刘家的秤，却偏偏是二十四两算一斤。

刘文彩对农民的盘剝，何止是大斗大秤。最主要的，还是他的“高租重押”和“铁板租”。誰要种他一亩田，得先交几斗谷子作押金。別的地主租出一亩田，收租谷一石，他收一石二三。租谷像铁板釘釘一样，不管天旱水澇，都得一次交清，顆粒不少。田一經你租下，不准你退佃，也不准你轉佃。可是，他却可以随时把田收回。他若不想租給你，只要一句話就夺了佃，田地和青苗一道被收去。

肖大娘租种了刘文彩一亩五分田，一亩要出一石六斗谷的“铁板租”。一九四八年，天旱收成不好，欠租六斗四升。肖大娘被刘文彩的狗腿子抓去，关在乡公所里，家中丢下五十多岁的丈夫和出生不滿四十天的幺女。娃儿沒奶吃，嗓子都哭哑了，丈夫沒办法，只好背起娃儿来监房喂奶。雨天路滑，丈夫一跤摔倒，就臥床不起，沒几天，丢下一家大小死去了。肖大娘死了丈夫，刘文彩还不罢手，硬逼着肖大娘把几只鸡和一头猪全卖了，才換得八斗谷子。肖大娘心想：交了“铁板租”，还剩下一斗六升。誰知道，粮食送到刘文彩家，他用大斗一量，八斗谷子变成六斗三升，还欠他一升。肖大娘无奈只好去給刘文彩当奶媽，当了七天，刘文彩嫌她年岁大，奶水不好，又把她赶了出来。肖大娘被逼得沒有办法，

只好到別村去討飯。

“巴地草儿根根多，难比財主鬼計多；高利貸下堆白骨，白骨堆上坐閻罗。”这是农民对刘文彩高利盘剝的控訴。刘文彩在雅安、成都、大邑開設的錢庄，所收利息是惊人的。有什么“滾滾利”，“場場利”，“砍期利”……所謂“滾滾利”，就是过一定时期，本利加一番。“場場利”是这样的：在南方农村，三天有一个集，“場場利”是每逢一集計算一次利息。这样的高利盘剝，农民那能受得了呢？一九四八年，农民植春元，在刘家同德錢庄借伪币二十万元（当时可买一石多米），不到半年，本利滾到四十多倍，后来把十几亩祖田折給刘家，还欠十多石大米。植春元沒有办法，只得給刘家作佃戶还債。

那些街房、当鋪、碾房、戏院、学校……无一不是刘文彩的“搖錢树”！他想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就拿街房來說，誰要租他一間，得先拿出三石米做押金，然后每月三石米交房租。

刘文彩那么多公館、街房、倉庫……是他花錢雇工修盖的嗎？不，絕大部分是农民的无偿劳动。

过去，安仁鎮居住着三千多戶人家。他修戏院和学校时，每一戶都得出一个人去当义务工。一九四四年，刘家要修的电厂开始动工了，在这里当小工的农民，不但拿不到工資，还得自带吃食和工具。如果誰家不来男劳力，妇女儿童是三工折一工。在工地上，誰如果稍有意慢，监工的狗腿子就用枪托、皮鞭毒打。当时，农民刘茂祥身染重病，担不动磚，被监工逼的沒办法，只好去担，結果累得吐血，不久就死去了；农民刘茂盛在工地上，发现家里起了火，监工硬不让回家，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房子被火燒掉。

很早以前，安仁鎮是个缺水的地方，人們这样形容它：“安仁乡干江壩，荒田一壩連一壩。”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叫佃戶拿出过多的租谷，刘文彩也知道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就命令农民出工挖河，把成都附近都江堰的水引导过来。这条河从灌县挖起，經崇庆、大邑到安仁，长约一百多里。一九三四年开始挖，一九三七年完成。四年当中，几乎是上万的农民，日夜在这里做苦工，人称这条河为万成堰。可是，当万成堰的水刚刚流出来，灌溉那久旱干渴的田地时，刘文彩馬上向这里的佃戶宣布：每亩田的租谷，由每年的一石三，提高到一石六。而修这条河的农民四年来却从沒有拿过一个工錢。

据統計，刘文彩仅在安仁鎮修公館、戏院、学校、电厂，就无偿派工一百五十三万三千四百多人次。

五

走进另一个陈列室，在这里看到了刘文彩家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稅。

民团費。以刘文彩为首的地主集团，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巩固他們的封建統治，組織了反动武装——民团。强迫每十戶农民，每月交一石米的团費。

枪弹費。为了加强这支反动武装，还强迫农民交枪弹費，多少不等。

自治谷。刘文彩当了“土皇帝”，独霸一方，向农民收自治谷。租地种的农民，每亩交四升，自耕农每亩交八升。仅在大邑县上仁乡，刘文彩每年就收自治谷一千八百多石。

光棍費。刘文彩組織了反动的哥老会組織——“公益协

进社”，强迫农民参加。如不参加，要交光棍费，否则，性命难保。

安全费。刘文彩一面勾结土匪抢劫农民，一面又以“保护安全”为名，强迫农民交安全费。每户一二斗或七八斗米不等。

马路捐。刘文彩家经常来往于成都和大邑县安仁镇、唐镇之间，为了让他们的小汽车能够在家门口直接驶到去成都的公路上，强迫农民给他修了一条三十公里的马路。为了修这条马路，每户要交马路捐大洋一元。

桥捐。刘文彩家借修建斜江大桥为名，强迫农民交桥捐四千多石大米。他们用这笔钱贩运烟土，买了五百多亩地。

堰塘捐。刘文彩家勾结堰霸（即管理堰水的封建头目），强迫农民交堰塘捐，每亩一升或二升米。

牛捐。养牛户都要给刘文彩家交牛捐。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間，仅在唐镇一地，就榨取牛捐一千二百多石米。

刘文彩家的苛捐杂税一时难以写完。他们派的捐税，一文也不能少，更不能拖欠。这些苛捐杂税压得农民连气都喘不过来。

农民陈绍宣家有一亩八分地，人多地少不够种，租了刘文彩五亩多地。每年除了交五石租谷外，剩下的两石还不够交他的苛捐杂税。有一年，旧历腊月二十七，陈绍宣的妈妈刚刚织完一匹布，指望卖了布换点米过年。谁知道，一清早，刘文彩家的狗腿子张仪程、张子忠就来催逼一斗八升米的民团费。两个狗腿子威胁说，如不马上交清，就绑人到监狱

去。陈紹宣的媽媽只好忍恨淌着眼泪，把机头上的布拆下来卖了交民团费。

六

走着走着，我們轉进了刘文彩的佛堂。在这里，神位、假桃假李等各种供香、大红緞子绣花桌幃和跪垫，依然整齐地陈列着。这一切，好像使人相信，刘文彩是一个多么信神讲道的人，可就在这佛堂背后，却是另外一个天地。

走出佛堂，穿过一个天井，再穿过一层圍房，是一个小小院落，这是地主庄园的最后一个角落了。这里孤零零只有一座房子，大概是因为一个豆腐块似的小窗，开在屋基脚下的緣故，冷眼一看，房子显得特别高。順着墙角的一个小門往里望去，黑洞洞的，迎面扑来一股寒气，使人毛骨悚然。这就是当年刘文彩殘害农民的水牢。

为了探个究竟，我們踏进牢門，繼續向里走去。走了約四五丈远，向左拐，是第二道牢門。从这里下了几层台阶，再走丈把远，靠左手，是第三道牢門。这里下去就是水牢，半人深的水，散发着难聞的臭味。水的正中央，立着一个一人高的铁籠。铁籠上有数不清的像牙齿一样的铁刺。一个人站进去，蹲不得、伏不得，只能笔挺地立着。我們都知道，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鎖，可是，鎖这道牢門的大鎖是特制的，它需要三把钥匙开三次才能开开。

看到这里，現在的四川省人民代表、唐安公社党委副書記冷月英的一段經歷，立刻在我們眼前出現了。

冷月英的丈夫冷树廷，佃的是刘文彩的田。一九三七年，天旱歉收，刘文彩派人来收租，罇罇罐罐倒的干干净净，还

差五斗二升谷。狗腿子們拍桌子扔板凳，無論如何不答应。这时冷树廷不在家，冷月英只好答应明天再想办法。

真是穷人路窄。誰知第二天公鸡还没有打鳴，冷月英的肚子几陣疼痛，就又生下一張嘴来。別人吃早飯了，她和大女儿还餓着肚子，无米下鍋。正在这个时候，狗腿子进来，不由分說，把她从床上拉下，捆起来，送进这黑魘魘的水牢，鎖进铁籠子里。

剛生了孩子的人，身上污血正多，被冷水一漬，肚子疼得像刀絞。当狗腿子第三次折磨她时，她已經不会說話了。狗腿子見她不行了，就用力把她往水里一推，冷月英几个踉蹌，幸亏倒在一个死人脊背上，才算沒有被淹死。

冷月英的丈夫冷树廷回家后，忍着高利盘剝，借来二十块銀元，到处托人情，才把人“贖”出来。

冷月英在水牢里整整泡了七天。出来的时候，腿上的血水結成了痂块，双脚上粘滿了死人肉。冷树廷天天用热水給她洗，用刀子給她刮，五六天的功夫，才洗淨刮完。

把一个善良农民关进水牢里，并不是天下奇聞，最奇怪的是，冷月英被关了七天水牢，刘文彩还竟要收“房”錢。一天一斗米，顆粒不能少。

从冷月英的控訴中，我們知道，这水牢，不只是关过一个冷月英。同时，我們也知道了，刘文彩迫害农民的工具，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水牢。

請再看下面一个事实：

一九四二年，又是一个災年，天旱缺水，田里的谷穗光发黃，不壯粒。該交租了，老佃农包秋白，把收获的黃谷全部拿出去交了，还欠八斗。可是刘文彩却說包秋白故意抗租

不交，把他綁进公館，严刑拷打。打得包秋白腿断骨折，惨死在老虎凳上。

刘文彩不仅有水牢、老虎凳，还有一百二十斤重的脚镣，四五斤重的手铐，彈簧鋼鞭……

看見这一尺多长的彈簧鋼鞭，不由得使人想起一九四〇年死去的老农安国齐。那时候，刘文彩逼迫农民給他义务修文彩中学。老农安国齐，一連做十五天苦工，病倒在床上，三天水米不打牙，实在不能再做了。可刘文彩的狗腿子不問情由，硬把他吊在梁上，用彈簧鋼鞭毒打，不到半个小时，安国齐就死去了。

七

刘文彩为什么能够这样无法无天，橫行乡里？

其实，这也是很明显的。旧中国的政权、法律都是为大资本家和封建地主服务的。而他的弟弟——軍閥，又是他的直接靠山。再加上自从他当了“川南稅捐总局总办”、“叙南清乡总司令”之后，有了錢有了枪，就进一步打下了他統治农民的政治基础，成了名副其实的“川南王”。他借着自己的錢和枪，成立了“公益协进社”——帮派組織。它下面設分社、支分社、支社，遍及大邑、邛崃、崇庆、新津、蒲江、眉山、彭山、丹稜、洪雅等十几个县。各地的土豪、劣紳、伪乡长，既是他的拜把兄弟，也是各分社、支分社的“舵把子”（即：头目），統轄了十万以上的“兄弟伙”。

刘文彩上通軍閥和官府，下結土匪头子。国民党二十四軍旅长金如梅、团长张星樞、张成孝，眉山专区专員霍六丁、大邑县县长陈平山等等，都是他的好朋友，四川省保安团

团长陈福安、川康山防大队队长郭保芝这样一些土匪头子，都是他的至亲，自己又统率着这样一支庞大的帮派组织，怎能不称霸一方！那时，大邑县不管那一届县长上任，都得前来刘家恭候。稍有言语不顺，手足不到，这位县长就站不住，坐不稳。刘文彩强占田地房产，摊派民工为他修戏院、学校，农民起来反抗，伪县长就赶紧带兵前来镇压，并且正式贴出布告：只准听从，不准反抗；谁要反抗，不问情由，先绑起来丢进监牢再说。

农民们受了刘文彩的欺压，想到官府去告状，有人就会说：“你一千张状子，抵不上‘总办’一句话！”

刘文彩本身，是地主、官僚、土匪三位一体的代表。而他的庄园，是旧中国地主庄园的一个缩影。

八

在这里参观了两天，我们对刘文彩的发家史的了解，只不过是一个概貌。

快要离开这里了。早晨，我们到田野里遛了一个弯，处处感到新颖。人民公社田地一片连一片。按照时令，十二月份正是隆冬季节，在我国的东北，已是皑皑白雪封地，可是这里放眼望去，仍是一片葱绿。农民种下的小麦已有两三寸高了，社员们挑着粪担子，去给庄稼追肥。田埂上，不时过来一条条肥大的黄水牛，这是它们的老习惯，冷天的早晨要出来散散步。牛背上的少年儿童，在谈笑逗乐；敬老院的老人，已经起来，给猪群添食，他们在这里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早已换了人间。刘文彩压榨农民

的鞭打声，农民交不出租谷的哭泣声，是一去不复返了。可是，今天，我們对于地主官僚吸吮劳动人民鮮血的猙獰面目，对于劳动人民昔日血泪斑斑的生活，永远也不能够忘記。

夏收时节的一场斗争

李 行

这一桩事，发生在福建省平和县山格公社的隆二生产队。

一九六三年春季，隆二生产队的生产情况很不景气。社员们罢免了原来被地主、富农拉下了水的生产队长，改选雇农出身的复员军人杨英汉当了生产队长。杨英汉才二十六岁，长期的部队生活使他炼成了一副刚强的性格，当队长真是拿得起，放得下，就是对农业生产还不十分熟悉。几个地主、富农听说杨英汉不熟悉农活，非常高兴。逃亡地主杨交篇的老婆林清，找到富农杨任伍专门议论这事。

地主婆林清说：“改选改选，选到了杨英汉头上，这人肚子里有几颗饭粒算得出来，生产搞不好，照样叫他下台！”

富农杨任伍说：“队里减了产，就叫他赔，赔不出，还得让我们的人当队长！”

……

没想到，这席话都叫杨老锡听见了。杨老锡是中农，杨英汉是他养女的未婚夫，他深怕杨英汉真的当不好队长招惹是非，担起了重重心事……

事情的发展，证明杨老锡的忧虑是多余的，因为杨英汉不是匹马单枪，他有着贫农、下中农的支持。

七月，沉甸甸的稻穗，把田野漫成了金色的海；从南边

送来的风，吹得田里泛起了陣陣的金浪。一天，楊老錫打从稻田旁边經過，边走边看，他告訴社員們說：“看样子，一成半的增产是十拿九稳了。”其实，老人心里却在贊賞着队里的当家人：“英汉这孩子，真有两下子！”

队里增产，人人喜欢，可是有一小撮人却大不高兴。在开镰前的一个夜晚，貧农陈銀练和楊幼，发现地主老婆林清走进富农楊任伍的家里，一直过了一个多钟头才出来；接着，楊英汉也看到富农楊任伍走进反革命家屬楊摆船的家里去“串門”。这些事情，引起了这三位貧农的注意。他們碰头一議論，問題就明白了三分：階級敌人可能在搞阴謀活动！

开镰了，作业組和去年一样，按居住情况編成三个組。其中第三組里的劳力，有些是地主、富农和他們的家屬。第一天中午，各組把收回的谷子挑到晒場上，第三組有人挑回的谷子便显得很特別，籬筐底下滴着水，倒出来一看，谷子不仅湿，而且拌着泥。負責晒谷的楊幼一看气坏了：“这是泥团，不是谷子！”挑谷的富农楊任伍应道：“倒伏的谷子嘛，有啥办法？”他滿以为这样一說就可以把事情瞞过去，反正晒谷的人沒下田，不摸实情。可是，楊幼却是个精細的人，他回来問楊英汉。楊英汉說：“不对，今天割的稻子，只是斜伏，都沒有倒伏，谷子怎会浸水拌泥巴？”楊幼馬上提議說：“有鬼，要加强监督。”

割稻时，地主婆和富农楊任伍的老婆何默，不但把割下的稻把往水里丢，还要将稻穗在水里翻一下。第二天，队里便派楊老錫到第三組去打稻，楊老錫拿起稻把一看，淨是水，有的还夹上烂泥，打稻要特別用劲才能脫粒；沒打几把，滿身便濺得湿漉漉的。他对割稻的地主婆說：“稻把都得攔在

稻根上，这样又好打又好晒。”連說几次，地主老婆不听，老头火了：“你們究竟是怎么搞的？怎么連說几遍都不改？”

“回去叫你的老婆割給你打。”地主婆林清撒泼了。

富农老婆何默也开腔了：“我們沒有請你来打稻！你嫌割得不好，就走！”

这时，富农楊任伍在一旁暗笑，眼睛溜这溜那，洋洋得意。楊老錫憋着滿肚子的气，勉强打了半天的稻子。

楊英汉回家后，楊老錫憤憤地把上午田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他。楊英汉一听，想了想，象发现了什么似地說：“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怎說？”楊老錫不解地問道。

“你不是听說过：减产了他們要找我算賬嗎？这一季增产了，他們当然不会甘心！你是老种田人，想想看，把稻穗往水里一泡，再用泥巴一蘸，至少可以加重一成以上；可是晒干以后，水沒了，泥巴脫了，大大卸成，和邻队一比，我們队里粮食卸成比例最大，他們不就可以說队长、保管串通起来偷谷子嗎？”接着，楊英汉还把那天夜里，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家属互相“串門子”的經過告訴了他。

“原来他們安下了这条毒計！这批东西，真比狐狸还刁啊！”老头恍然大悟：“孩子，該怎么办？”

“別急，狐狸尾巴只露一点，要等它全露，然后揪住它！”

当天晚上几个貧农碰了头，楊英汉把上午发生的事告訴大家，商量好让貧农楊水涨到第三組去，加强这个組的工作。

楊水涨和貧农社員們一起研究了地主、富农的表現，觉得情况严重，就商量了对策。三天后的一个下午，队里发起了收割情况总检查，貧农們从楊任伍一伙人割得稻草堆中发

現了一些沒有打的稻子；同時發現那些打過的稻草，還夾着三分之一沒有打下的谷粒。楊水漲憤恨地說：“鬼把戲原來是這樣耍的。”當場捆回了两把稻草，作為向社員們進行教育的材料。於是，這兩把稻草，就象火種一樣，傳到哪裡，哪裡的怒火就馬上燃燒了起來。

在總檢查的前一天，隊里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早上，楊幼很早就吃了飯上晒場去，向夜里守谷堆的人接班晒谷，掀開昨夜復蓋谷堆的谷簞，忽然發現谷堆缺了一處，在缺處的地面上撒着谷粒，再細看谷堆上的灰印號有些異常，這一下，他汗毛都豎了起來，放聲大叫：“谷子叫人偷了！”

晒場就在大隊辦公室的門口，楊幼這麼一嚷，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楊國昌首先跑了出來，隨後，就有十幾個人跟着來到這裡。反革命家屬楊擺船裝得特別關心，他左看右看，對楊幼道：“你真是白天說夢話，谷堆上的灰印號個個都在，從哪兒偷？”楊幼看看人多了，便當場揭穿：“請大家細看，公家的灰印斗圈徑比這個要大；再看灰印上‘隆二’的字划，公家的也要比這個粗；還有，我親手蓋的灰印，字字分明，不這樣糊塗，偷谷子的人一定假造了一個灰印斗！”

“要追查到底！”社員們看到幾個月辛勤勞動得來的果實被偷了，誰不發火？

這時，楊國昌勸大伙說：“大家還是先下地干活去，這件事，我們負責到底，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等社員們下地以後，楊國昌和生產隊幹部及幾個貧農骨幹們開始追根，把可疑的人排了隊。

“昨天楊擺船沒出工。”

“他从来沒守谷堆，也从不到晒場来，昨晚上却一直在晒場上溜。”

“到鸡叫的时候，村里狗叫四趟，他家的門开了四次。”

“今天，他硬說谷子没人偷，可是神色最不对头。”

“……”

把这些事实連成一串，情况就很明显了。接着，在这个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屋里发现了滿滿一缸的新谷子和一个假灰印斗。楊摆船再也不象先前那么神气了。在铁的罪证面前，他一五一十交代了富农楊任伍唆使他偷谷子的經過。在群众揭发下，偷谷的事情真相大白。

七月十九日，楊英汉和楊水涨、陈銀练三人带了稻草和假灰印斗，跑了八里路到了公社。公社党委正在召开工作组、大队干部、貧农組长的會議。这个会已开了三天，会上正是討論階級教育的事。当稻草和假灰印斗在會場上摆出时，二百多双目光都被吸引过来了。

楊英汉把稻草摊撒在地上，气憤憤地說：“請大家看，这打的是什么稻子？这完全是敌人有計劃的破坏！”三位貧农在会上相继揭发了階級敌人的破坏事实，也讲述了貧农社員們和階級敌人斗争的經過。

公社会議結束后的第三天晚上，高际大队的社員齐集在大队門口的晒場上，在公社和大队干部的主持下，召开了斗争大会，隆二队的社員不仅揭发了階級敌人在夏收中的破坏活动，而且还揭发了地主、富农故意把耕牛喂瘦，将收成的烟叶故意不晒让它烂掉，明目张胆地大搞投机买卖等勾当。地主老婆林清和富农楊任伍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承认了他們相互勾結的破坏阴谋，根据群众意見决定

要他們賠償損失，并交群众管制生产。

狡猾的狐狸终于被捉住了，斗争胜利了，生气蓬勃的隆二生产队，黄麻、花生又获得了丰收。晚季插秧、除草、施肥的各项生产工作，都搞得更为出色。

警惕地主爭夺青年的阴謀活动

中共晋东南地委办公室通訊組

故事发生在山西省潞城县羌城大队。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在乡知識青年王忠祿噙着兴奋的眼泪，激动地写着日記：“今晚，我被光荣地評上了‘五好’社員。是党的階級教育挽救了我。我从歧路上走回来了！……”夜很深了，王忠祿翻来复去睡不着，回想着自己是如何上了地主的当，走上歧路，又如何能在党的階級教育下，清醒了过来，从新走上康庄大道。

回乡前后

一九六一年夏天，王忠祿从长治南垂中学毕业了。他和許多同学一样，也走上了农业第一綫，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年前，王忠祿考上了南垂中学。他曾和本村的几个同学各自叙說过自己的心願。有的說，将来要当个拖拉机手；有的說，将来要当个农业专家；只有王忠祿的打算跟別人不一样，将来非当个干部不可。他牢記着父母常說的話：“忠祿，你将来毕业了，大小在外边当个干部，咱王家也能改一改門风！”

在三年的学校生活中，王忠祿每次参加劳动的时候，总是这样想：劳动也算一門功課嗎？将来当干部还需要劳动知

識嗎？每听老师讲到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青年人的光荣任务的时候，他总是这样想：将来当了干部，以工作組的名义下到村里工作，不也是建設新农村嗎？……

在临毕业的这半年里，在学校党团組織的教导下，王忠祿对于将来干什么的問題，总算有了个比較正确的認識。他从道理上想通了，他个人的志願，應該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終于走上了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这条光荣道路。

回家后的第二天，王忠祿就跟上社員們下地劳动了。他剛参加劳动的头几天，刨地，手上打起了血泡；担粪，压肿了肩膀，点肥，渾身濺滿了圍糞……劳动一天，渾身酸痛，骨架象是散了。这本来是暫时的現象，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可是，冷言冷語不断地襲击着他。有的說：“中学生种地是大材小用。”有的說：“好的不回家，回家沒好的，回来的都是些沒出息貨。”忠祿的父亲王明旺也說忠祿不爭气：“为什么別人能升学，你就不能？……”

剛剛踏上生活里程的王忠祿，在“劳动关”前打了敗仗，在“輿論关”前也頂不住了。他整天垂头丧气，悶悶不乐，悔恨自己不該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一心想离开农村到外边找个工作。

地主伸出了魔爪

年輕的王忠祿哪里知道，就在他遇到阻难而发生动摇的时候，地主李冬保便伸出了魔爪，从“体貼”和“同情”入手，企图把他引入歧途。地主李冬保在旧社会是个杀人不見血的“狐狸精”。自从土改以后，却装得象个“笑面虎”；見人就笑，开口不叫“老哥”，便叫“老弟”；若是干部，总要称官道銜，

酸溜溜地奉承一番；开会时，还要搜寻着說上几句进步話。可是，在他的內心里，却对党对人民有着刻骨的仇恨。他成天思謀着：怎样才能“变了天”？要变天，就得搞垮党支部；可是党支部象铁桶一样，使他无縫可钻。后来，他就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挖根子的”毒計，拉攏青年，腐蝕接班人，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們后一代的身上。

李冬保和王忠祿同在一个生产队，有一天，在休息时，李冬保凑到忠祿跟前，体貼地問：

“忠祿！你打算就这样窩囊下去呀？”

“唉！没办法呀！”

“忠祿啊，論你的才干，比咱村誰都强。在家有什么出息！种地受这份罪，无奈何才干这一行。不趁年輕时候到外边找个工作，見見世面，就苦了你这一辈子啦！”

忠祿“唉”了一声，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李冬保，一股暖流冲上了心头。他觉得李冬保是“知己”的人。在李冬保的唆使下，忠祿果然在一九六二年夏天离开家到潞城县、长治市、张庄等地，考学校，找工作，結果一事无成，抱了一肚子的不满和怨气回来了。

大队党支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让团組織劝說、教育王忠祿，要他坚定立場，經得起劳动的考驗。

地主李冬保見团支部叫王忠祿开会，又听說有人和王忠祿个别談話，生怕把一条“上了鈎的魚儿”滑脫，就在背地里更加紧了对王忠祿的拉攏。一天，队里突击送粪，李冬保赶着牛車，王忠祿赶着馬車，走在半路上，李冬保把嘴巴凑到忠祿的耳边，用关心的口吻問：

“你升学了嗎？”

“升个屁！”

“找下工作了？”

“那么容易！”

“听说，团支部还叫你开会，可能也是给你想办法吧？”

“哼，想办法？他们让我安心在村里劳动哩！”

“唉！他们自然是要你安心在村里劳动，因为走了一个干活的，他们就要少一份光沾。咱们象牛马一样，倒要受死了。看人家（干部们），成天指手划脚，根本就不关心咱们……”李冬保这一席话，有意地把忠禄不愿参加农业劳动的情绪，扭到反对党团干部上了。

忠禄没有吭声，一路上紧锁眉头，怒冲冲的。李冬保见此情形，打心眼里暗暗高兴。

忠禄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他出勤少了，做活质量低了；而且和几个表现不好的地富出身的青年整天在一起鬼混；今天跟干部无理取闹，明天写匿名信告发干部。他这种行动，受到了地主李冬保的称赞，“忠禄这孩子，果然是个有才干的人！”

一天晚上，忠禄拉肥回到家里，身上很疲劳，心里很烦恼。为了发泄一下内心的不满，他拿起笔来，便写了一篇咒骂新社会，咒骂干部，污蔑集体经济的日记。

李冬保见了这篇日记，可高兴透啦。他赞不绝口地对忠禄说：“忠禄啊，你写得真好！你比咱村的其它中学生都强，写的都是些实话。今后你该多多的写……”

王忠禄上当以后，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行为，引起了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的不满。他们说：“忠禄跟上鬼了。”纷纷向党支部反映了这一情况。党支部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王忠

祿从階級敌人手里夺回来！帮助这个走上歧途的青年人归队。”

在階級斗争中觉醒了

震撼人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大队展开了。这一天，王忠祿和他父亲王明旺参加了全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大会。会上，許多貧下中农社員，以活生生的亲身经历，回忆了在旧社会地主、富农残酷压迫剝削农民的血泪史。忠祿头一次听到这些血泪控訴，貧下中农的每一句話都紧紧地扣击着这个貧农子弟的心弦：

貧农郭根辰，一身背着七家地主的債務，腊月三十日，全家人被赶出門外，大門上鎖了七把鎖子。

一九四三年，地主李子文一戶就烂了五十石小麦，而全村却有四十八戶貧苦农民討飯，二十四個貧农被活活餓死。

貧农刘老丑身負重債还不起，地主竟把他十三岁的妹妹搶走，作为“童女”活活陪了葬。

……

忠祿听着，身上不断地打着寒噤。当他听到刘老丑的妹妹的遭遇时，情不自禁地淌出了热泪。他第一次感到“地主”、“富农”、“压迫”、“剝削”这些过去听来很空洞的字眼，現在有着具体的、生动的內容；他第一次对李冬保、李子文这些过去看来很不错的人，有了个新的認識，他們就是地主、富农，就是曾經吸食农民膏脂的寄生虫。

在会上，王忠祿不只听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还听到了現在发生的事情。現在这些家伙还不甘心死亡，还在搞复辟活动；有的地主家里存着“变天賬”；有的地主威胁队干部“留

点后路”；有的地主煽动富裕中农闹单干……

是啊！这个年轻的贫农儿子，在人们庆祝解放的欢呼声中降生，到今天，十九个年头，一直生长在幸福中。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穿，入高小，上中学，向来无忧无虑，他怎么知道这些呢？在学校虽也听老师们讲过阶级斗争，但他对旧社会的印象，象个神话故事，地主老是个“大肚皮胖子”。

现在他的头脑开始清醒了。自从参加大会以后，他的心，无论如何不能平静。他想起了地主的狠毒，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李冬保。他以前觉得，李冬保这个地主，似乎和别的地主有些不同，不管以前怎么样，这几年总算对自己不错，还称得上“知心人”。现在当他把自己这两年走过的路和李冬保连起来一想，就否定了这种看法。这两年来，他确实和大家走的不是一条路，和党不是一条心，不安心在农村，写坏日记，不听从干部领导，不好好参加劳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样好的时代，我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党、团支部教育我不要这样做，而地主李冬保却偏偏鼓动我这样做呢？这是不是上了李冬保的当？……”

王忠祿越来越觉得自己从前走错了路，他特别留意到地主李冬保近来的表现。自从全村社会主义教育大会以后，李冬保再不接近他了，也不象从前那样，背地里对他说长道短了。于是他在思想上肯定了一条：李冬保对他确实没有怀下好意。“我上当了，真的是上当了！”他越想越觉得可怕。

谈“家史”在全村成了风气，凡是贫下中农户，谁家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可是，王忠祿还不太知道自己家的历史。一天晚上，他向父亲王明旺问起了这件事，父亲沉默了一阵，痛苦地回忆起在旧社会的重重苦难，然后，慢慢地给忠

祿一輩一輩地說開了。

父親一說話，聲音就有些沙啞、低沉。忠祿心上動了一下，但沒有吭聲，他聚精會神地听着：

“舊社會，哪有窮人的活路。咱家原來住在王家圪郎（胡同），你爺爺弟兄五個，都是當長工出身。因為咱王家長工多，人們慢慢就把‘王家圪郎’，叫成了‘長工圪郎’。”

“你爺爺一輩子給地主當長工，背債務，辛苦一年，臘月過不了‘鬼門關’。欠了李明文等三戶地主的一百多元債，‘黑驢打滾’利滾利，三年滾成三百石。一九四六年臘月二十三，三家地主一齊來咱家逼債，可咱家除了兩間破房以外，一貧如洗，怎能還起？你爺爺被逼得走投無路，只好答應人家到臘月三十日，一定本利還清，可這又憑什麼還啊！……”

忠祿父親哽咽得說不下去了，坐在一旁的母親，默默地擦着眼淚，一家人沉浸在辛酸的回憶中。

父親稍停了一陣，繼續說：

“記得，那年我才十三歲。臘月二十七黑夜，天降着鵝毛大雪。我見你爺爺扒住門環，向外看了很久，然後，把他那件破棉袄往身上一裹，摸了摸我的頭，給你奶奶說：‘我走吧！不走不成呀！你要保重點身體，好好帶着孩子……’我哭鬧着，不讓你爺爺走，你奶奶流着淚，哄着我，對你爺爺說：‘走吧！盼你轉個好運，過兩年就回來。’你爺爺摸了把臉上的淚水，就冒着風雪走了。走後，地主們來逼債，你奶奶無可奈何，只好賣掉房子，還了地主的一部分債務，帶着我另租了人家兩間破房安身。你爺爺一走八年無音信……後來我長大了，就在村上租地種，到長治拉洋車……”

忠祿父親一直說到了解放以後。

“忠祿啊！你可要記着，毛主席和共产党是咱們穷人的救命恩人。土改时，給咱分了房子分了地，还分了大車和牲口，以后又領導咱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光景一年比一年好，咱祖祖輩輩誰念过书，到你手里成了中学毕业生……以前我一心想让你念书好当干部，这是爹的不对。爹思想沒赶上趟。这会，咱們公社就得要有文化的人，你就下决心在乡村干一輩子，为咱貧下中农爭光。”

忠祿父亲的話音，由沙哑、低沉，变得高昂而爽朗起来。带笑的眼角上还留着泪痕。忠祿問：

“爹，咱住的房子是分誰家的？”

“是地主李冬保家的嘛！你这个傻孩子，連这也不知道？”

“啊！冬保家的！”忠祿惊讶地叫了起来，可是他沒有再說什么。

夜很深了，忠祿的母亲催他們睡下了。忠祿灭了灯，滿屋漆黑，但他却觉得心明眼亮。他想起了自己以前走过的路，恨透了李冬保，他握着拳头往炕上一击，狠狠地下定决心：要和他决裂，要和他斗争！

重新归队

一个多月来，王忠祿参加了許多次貧下中农會議。开头几次，他总是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好象这个会沒他参加一样。这一次，他站起来了，走到人前头，他按不住滿腔怒火，无情地揭露了地主李冬保拉他走上歧路的罪行。

“我以前錯把毒药当蜜吃，錯把敌人当好人。我忘了本。我上了地主李冬保的当，做了对不起党、对不起前輩、对不起大家的事情。”

王忠祿把他上当的前前后后，說得一清二楚。最后，又拿出那篇日記，往众人面前一放，斬釘截铁地說：“这就是地主李冬保勾引我走上歧途的罪证！”

王明旺听了儿子的控訴，也更加醒悟过来了，他立刻意識到，是李冬保勾引自己儿子走上了歧途。現在看来，这就是階級敌人和我們爭夺青年一代的斗争。

大家听了王忠祿对地主李冬保的揭露，无不怒火填胸，都說，地主階級总梦想复辟，我們可不能放松警惕啊！

經過一場深刻的階級教育之后，王忠祿从歧路上走回来了。他觉得农村不仅需要知識青年，而且需要有坚定的无产階級立場的知識青年。他深深感到，农村的确是个广阔的天地，的确有着美好的前途，他根据全大队的远景规划，想到今后的羌城村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他越想越远，越想越好。他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